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341 期
2021 年 12 月 15 日

目 录

【论 文】

-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视角 刘 焯
-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三大争论”及评析 吕秀彬
-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 19 世纪德法两国“自然疆界论”的剖解 于逢春、冯建勇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视角¹

刘 焯²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最强有力的、科学的、能够解释和关照人类社会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起，发展和丰富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使之成为一个更加完备、客观连续、与时俱进的理论构架。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多姿多彩的民族范畴研究当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了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建构主义等多种阐释路径，尽管包含了多样态的解释视角，但都共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可以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样一个名称进行统摄，展示出丰富的学术性价值。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要探索当代民族范畴的前景，我们有必要从整体上把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格局，以借鉴、吸纳、批判的态度进行认识。本文从历史沿革、阐释路径、整体特征、价值意义及其局限等方面观察、解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视角，力图在客观分析、辩证考察、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系统化认知。

关键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问题

在当今世界，民族及其相关范畴的研究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而且新的研究著述也是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各国思想家都从多学科、多角度对民族范畴进行分析阐述，作为民族范畴研究当中的主要学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连续性、解释性和科学性上可谓无出其右，从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民族国家的关注开始，到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斯大林、卢森堡、考茨基等对于民族解放、民族独立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与论述，再到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不断认识，从而形成了一种客观连续、辩证发展和整体系统的历史生长过程。我们要探索当代民族范畴的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作为新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新认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坚持，又有符合新的时代特征的发展与创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兼容并蓄、不断发展的强大普适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历经了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其认识论普遍地适用于民族问题的阐释，这一点不仅得到了历史实践的证实，更得到了现实状况的检验。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是一个漫长、持久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论波兰》《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析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探讨民族压迫和剥削问题、阐述民族平等和解放原则、揭示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的实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入20世纪，面对汹涌澎湃的帝国主义巨浪，列宁、斯大林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相结合进行了新的阐述，尤其是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围绕民族和殖民地、多民族国家结构、民族自决权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一步形成一个更为系统、科学、整体的理论。在同一时期，卢森堡、考茨基、葛兰西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卡尔·伦纳（Karl Renner）等人也在领导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提出了各自不同观念的民族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民

¹ 本文刊载于《世界民族》2021年第2期，第1-12页。

² 作者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族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旧秩序的冲击，“1945年之后，各国争取独立及反殖民化的运动都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结为一体”¹。“20世纪30到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总是呼应左派理论，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理论”²，伴随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撒播到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国家。此后，亦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解释范式理解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米洛斯拉夫·罗奇（Miroslav Hroch）、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霍勒斯·戴维斯（Horace Davis）、汤姆·奈恩（Tom Nairn）、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伊恩·卡明斯（Ian Cummins）、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沃克尔·康纳（Walker Connor）、罗纳尔多·穆克（Ronaldo Muchck）等，他们在秉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出不同阐释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共同型构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

关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理解民族国家的存在本质、阐释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基本目标和现实考量是现代哲学思考中的基本问题。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十分复杂的、极富争议性的范畴，已然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析论争，呈现出多种阐释路径的理论观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涵盖了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建构主义等多重研究视角，尽管包含多重分析角度，但都可以归属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哲学探讨，考察其理论成就，挖掘代表性学者的典型性和独创性。

一、历史主义视角

从历史主义视角界定民族及其相关概念是一种具有普遍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种视角强调民族范畴的历史本原，重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注重两者在群体凝聚和国家创立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一视角中，民族范畴都是历史循环进化的产物，它们能够根据具体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状况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代表人物为捷克历史学家米洛斯拉夫·罗奇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罗奇在《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中运用量化的社会史分析方法对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运动作了系统研究，他强调历史发展当中民族的主体作用，指出在碎裂的社会里，族群认同起到一种凝聚作用，因为“当社会崩倒，民族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³。他认为，“民族的概念是历史起源的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⁴从具体的历史范畴和社会关系出发，他指出，“民族是一个大的社会群体，其特点是几种关系（经济、领土、政治、宗教、文化、语言等）的结合。”⁵现代民族的形成离不开民族意识的增长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增进，“现代民族……存在的先决条件是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视为其成员，并自我认同”⁶。只有整个群体对自身这一“界限明确的复合体”产生强烈的感情，成员之间形成稳定的关系，加之共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等社会背景，民族才能出现。罗奇写道：“如果没有民族认同观念的传播和属于一个民族的积极价值，民族的形成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早期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文化（族裔）关

¹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²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³ 转引自（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7页。

⁴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

⁵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5.

⁶ Miroslav Hroch, *European Nations: 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5, p. 496.

系、共同的历史经历、某些政治制度或制度化的社会和文化关系，那么民族的鼓动就不太可能成功。”¹可见，人民大众对于民族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忠诚热爱的情感意识是现代民族的基础。

由此出发，罗奇形成了“三阶段”民族运动理论：阶段A，一些精英分子积极投入学术性的研究和调查，了解本身族裔群体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特性，但目的不在于煽动爱国热情，或是设定任何政治目标。“学术活动的自然延伸迟早会让受过教育的精英得出结论：一个族裔共同体的成员（一个国家的公民）需要被鼓励去拥抱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和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的理念。”²阶段B，一批行动主义者出现了，他们会想尽办法赢取族裔群体的支持，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的计划。“在阶段B，民族运动的传播与社会交往和流动性的发展是手拉手的”，“高社会流动性为阶段B的民族运动接受爱国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社会交往，作为一种传递现实信息和数据以及植入态度和本能反应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在民族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³，两者相结合，共同推进了民族运动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阶段C，当民族意识成了多数人的主要关怀时，群众运动便会形成，也唯有在此一时期，才有可能出现完全的社会结构。只有当民族鼓动在大众层面取得决定性的支持时，他们通往现代民族的道路才是不可逆转的。“一旦民族认同被大众接受，它就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直到阶段C——当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发生时，民族政治计划通常才会形成或变得与众不同。只有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以及民族运动获得了政治自治或独立之后，我们才可以谈论最终的成功和民族运动的结束。”⁴换句话说，阶段C的大规模民族运动使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得以最终型构，民族国家自此形成，民族运动也告一段落。

霍布斯鲍姆“始终坚持要将个人的非历史信念加以屏除”⁵，他在《传统的发明》《民族与民族主义》等著作中梳理了民族、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指出正是人民大众对征服者、统治者及压迫者的不满和愤懑使得争取解放的民族运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⁶。他从世界历史入手分析民族问题，认为民族的概念“根源于特定地域，成长于特殊社会背景，成型于既定历史时空。因此，必须将‘民族’的概念还原至这些历史现实来进行讨论”⁷。由此，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还原到历史运动中去，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国大革命到1870年，民族主义萌芽。“在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时代，民族便和‘人民’及国家密切相关，于是‘民族国家’和‘合众国’的呼声响彻云霄。”⁸正是从“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民族”开始被应用到世界政治体制之中，民族国家作为最有效的政治体系垄断了权力、法律、政治行动和政治制度，并大幅改写了欧洲的版图，群众的、公民的、民主的政治民族主义产生。第二阶段，1870年到1918年，民族主义发展转型。“当时欧洲社会正在经历的三大巨变，促使那种基于想象多过根据实情所建构出来的民族共同体一一诞生”⁹。通过“把民族与语言问题合并思考”，霍布斯鲍姆提出了“语言民族主义”的概念，并以此指称这一阶段基于语言属性而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第三阶段，1918年到1950年，民族主义最高峰。这段时期民族主义与左派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的侵袭。霍布斯鲍姆感叹道：“若说19

¹ Miroslav Hroch, *European Nations: 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 London and NY: Verso, 2015, pp. 496-497.

² Miroslav Hroch, *European Nations: 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 London and NY: Verso, 2015, pp. 504-505.

³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83.

⁴ Miroslav Hroch, *European Nations: 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 London and NY: Verso, 2015, pp. 80-81.

⁵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⁶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⁷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⁸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⁹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世纪的‘民族原则’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大获全胜，那显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¹此后的三十年，“反法西斯的民族主义，除了与民族冲突有关之外，也与社会冲突紧密联系，这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愈来愈明显。……在反法西斯的战斗中，民族胜利与社会革命都是不可分的。”²第四阶段，20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式微。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一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虽然为世界增加了十六个民族小邦，但是“现今的民族主义已呈衰微之势”³。此前的民族主义是历史变迁中的主要事实，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⁴。

二、建构主义视角

这一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民族范畴的社会建构特征着手分析，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社会形态的产物，“民族的产生应归于‘被创造出来的传统’，这些‘传统’是社会工程的产物”⁵。代表人物为美国左翼学者霍勒斯·戴维斯和在当今世界同享盛名的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佩里·安德森两兄弟。

戴维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一书中从民族、民族集团、民族主义等相关概念的原理研究出发，追溯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相关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对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进行分析。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民族问题的重要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最具科学性和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也看到了民族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重要性，“对于列宁和马克思来说，国家理论，尤其是民族主义，都显得非常重要”⁶，“对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今天的人们来说，民族国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没有它”⁷。戴维斯认为，迄今为止，将民族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尝试寥寥无几，且不令人满意。他希望借由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解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现象，他写道：“民族主义动机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剧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须被关注并与其他运动相关联。我们绝不能忘记孙中山的格言：民族主义（与民主和社会主义一起）是当今三大运动之一。”⁸关于民族的产生与定义，戴维斯指出，“民族不会自己创造自己；它必须被建造”⁹，民族的产生是具有建构性的，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族主要以三种方式形成。首先，它们可能是由国家形成的。……第二，民族是在反抗外来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民族形成的第三种方式是首先实现文化团结，然后是这种团结的政治表达。”¹⁰他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总是有（1）特定的领土；（2）确定的最小规模；（3）某些整合（集权化、相互依存）；（4）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¹¹

进而，戴维斯考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国际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意义上，与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是相当一致的，特别是如果这些民族解放运动是朝向社会主义的”¹²。民族解放运动是民族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效途径，“民族解放运动是最符合逻辑的……对抗殖民和半殖民地的压迫的手段，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必然同意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压迫进行反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有

¹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²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³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⁴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⁵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⁶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1.

⁷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8.

⁸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3.

⁹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12.

¹⁰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p.8-9.

¹¹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8.

¹²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18.

时显然是理性的”¹。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将民族主义融入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当中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参与反对经济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是不够的；他们必须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新将自己定位于斗争的新的性质当中，它首先往往是民族主义，而非其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继续发扬列宁的精神，因为列宁采取了关键的步骤——将民族剥削和阶级剥削结合起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²正如日本学者石田政治的评论所言，“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精神，贯穿在（戴维斯的）全书之中”³。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通过复杂而细致的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方法以及“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⁴，建构出一个一般性历史论证，即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印刷资本主义使得民族得以通过线性的时间而运动。民族的这种由群体想象、创造出来的边界意识和身份认同恰恰体现了其建构性特质。本·安德森指出，“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⁵，在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时代，民族梦想成为自由、自主、自决的，其衡量尺度与象征就是主权国家，因此，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总是以民族国家为旨归。本·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解读是：“当某一自然领土上的居民们开始感到自己在共享同一命运，有着共同的未来，或当他们感到被一种深层的同道关系联系在一起时，民族主义便产生了。”⁶可见，民族主义是被共同的认同力量创造出来的，这种忠诚感、同志爱将所有的民族成员无差别地容纳在一起，构建了现代社会当中真实、有效、复杂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本·安德森不仅强调民族情感对于民族主义建构的重要影响，也看重社会发展对于民族主义产生的促进作用。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升阶段，民族主义有一定的进步性，它不仅具有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功能，还具有激发民族革命和解放运动的作用。本·安德森分析了以民族、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建构，认为世界现代历史正是由构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一具体的过程组成。他写道：“民族-国家地位……被认为代表了想象的家园与想象的家园主人的一种新发现的结合，并通过有组织地运用它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确保那一结合的稳固。”⁷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来源于群体与个体意志的结合，按照其“想象”，民族国家的合法地位体现为自由行使自身的政治权利、自主支配自身的经济资源而不受外来力量和威权的干预，并通过这两者确保民族国家政权的稳固。由此，本·安德森“描绘出民族开始被想象，以及一旦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塑模、改编和改造的过程”⁸，在他那里，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主义建构性是不言而喻的。

佩里·安德森作为当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十分关注民族问题，他指出，“在工业军备和学术研究的新世界里，民族特性已成为竞争大国重要理论论述的对象”，“即使在今天标志着欧洲资本主义的高科技消费和国际一体化的世界里，作为政治生活的动力的民族激情也是永恒的”⁹。在《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一文中，佩·安德森指出，多样性和连续性是人类共同的结构，它们应该作为民族意识形态的固定点。他认同安东尼·史密斯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将基本的神话素（mythemes）改写成了自己的‘诗意空间’或‘英雄记忆’形式”的观点，这

¹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22.

² Horace B.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245-246.

³ (日)石田政治著，林茂森译：《〈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一书评介》，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1期。

⁴ Benedict Anderson, *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

⁵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⁶ (英)B·安德森著，少辉译：《民族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载《天涯》1999年第4期。

⁷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2-83页。

⁸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⁹ Perry, Anderson, “Nation 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13, No.9, May 9, 1991.

种“改写”正是一种民族的后天建构方式，即“民族自我意象的创造物”¹。在此基础上，佩·安德森重点分析了“民族特性”和“民族认同”两个概念，他认为，民族特性是全面的、无须参照的和客观的状态，而民族认同则是主观的、选择性的、更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他写道：“如果民族特性被认为是一种固定的性情，民族认同就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投射。”²不难看出，对于佩·安德森来说，民族认同与心理上的自我意识归属关系密切，它通过主观要素表现出来，“民族认同就是假设这样的伪装：融合事实和理想、易变和永恒”³。民族认同是个体从属于特定群体的标志，其产生过程是建构性的，是事实与理想、变与不变的综合型构，因而在其不断的发展和建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存在只能以永远寻找自己为代价，永远朝着其逻辑发展的方向转变，不断检验自己与他者的对抗，用最好的、最本质的一部分来认同自己”⁴。

三、社会经济视角

这一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强调从社会经济角度对民族相关概念进行探讨，认为在当今资本扩张、工业发展的经济型社会，民族问题体现了现代世界的社会经济机制，每个民族国家都在寻求自身的经济繁荣和利益最大化，因此，投射在民族共同体上即是不同发展状况的民族国家对世界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差异态度和表现，代表人物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汤姆·奈恩和同为新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赫克特。

在《不列颠的瓦解》《民族主义的面孔》等著作中，奈恩从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视域出发，认为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伴随着世界历史和社会情境的繁复变化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社会新兴经济因素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主导下世界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后果，是社会形态从传统发展到现代的必然环节。正是现代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的日渐强大和不断扩张催生了民族主义，他写道：“民族主义，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式的强迫的必需品，自然地来自这些新的发展条件。”⁵奈恩分析民族范畴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理论，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生产力飞速发展、物质极大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帝国主义掠夺、暴力战争横行、殖民侵略扩张等可怕后果。帝国主义是“发达对不发达地区不可抗拒的、变形的冲击”⁶，民族主义进而作为对此冲击的抵抗而出现，“在本质上是对强制执行的‘不发达’困境的一种反应”⁷。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进一步扩散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究其根本就是新型社会经济因素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机制。民族主义并非必然是民间传说、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民俗学构建，也并非必然是主体的忠诚、情感与认同，但必定是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反应以及现代历史当中最首要、最严峻的不均衡性事实的映射。奈恩认为，“哲学思考的真正基础是围绕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⁸。在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畛域内，民族国家间不均衡发展的真实情境赤裸裸地呈现在当代国际关系之中，使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愈发复杂难解，并持续支配这些问题的未来走向。

赫克特的《内部殖民主义》《遏制民族主义》等书试图解释的对象是族裔冲突与同化问题，他认为“社会同化论”的“扩散模式”是一种过度乐观的社会变迁模式，实际的、真实发生的是“内部殖民模式”。随着工业资本主义不均衡浪潮的涤荡，必然会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先进、发达的和 not 先进、落后的两种群体，核心的发达地区会从政治和经济上支配和剥削边缘的不发达地区。

¹ Perry, Anderson, "Nation 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13, No.9, May 9, 1991.

² Perry, Anderson, "Nation 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13, No.9, May 9, 1991.

³ Perry, Anderson, "Nation 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13, No.9, May 9, 1991.

⁴ Perry, Anderson, "Nation 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13, No.9, May 9, 1991.

⁵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1977, p. 334.

⁶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1977, p. 342.

⁷ Tom Nairn, "Scotland and Europe", *New Left Review*, 1/83, January-February 1974, p. 69.

⁸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1977, p. 358.

“边缘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相对敏感。投资、信贷与薪资的决策都以核心地区唯命是从。由于这种经济上的依赖，边缘地区的财富必然落后于核心地区。”¹ 而伴随着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越发严重，不先进的、边缘地区的民族越容易进入一种团结的状态，再叠加文化差异所引发的社会情感，必然会产生要求独立、发展的斗争。赫克特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具有两面性的事物，所以通常只能按类型对其进行分类”²。他将民族主义分为四种类型，即国家建设民族主义（State Building nationalism）、外围民族主义（Peripheral nationalism）、领土收复民族主义（Irredentist nationalism）以及统一民族主义（unification nationalism）。虽然同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赫克特仍希望可以遏制民族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太多的生命假民族主义之名被牺牲了”³，作为当今世界一股极为强势的力量，“暴力常常是民族主义冲突的副产品，因此，人们普遍希望遏制民族主义的这一面”⁴。他认为，现代社会民族认同的式微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发展倾向，因此，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极端行为，就要从降低不同民族群体的主权要求和建立“非直接统治”上入手。他写道：“有时候一些更加重要的公益产品会胜过主权。其中之一就是经济福利。尽管主权可以为民族群体成员提供自决，但是，对自身经济福利的关心可能会产生抵消作用。融入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会给外围民族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丰厚利益。”⁵ 可见，只要给予群体足够的经济平等和利益共享，民族主义的暴力、冲突就会自然而然地被遏制，民族主义的产生与遏制归根结底都是共同体在经济层面的博弈。

四、社会政治运动视角

这一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侧重于解读社会政治运动对民族范畴的作用。在此阐释路径中，“‘民族主义’这一术语用来指寻求或行使国家权力并以民族主义的论点为这种行动进行辩护的政治运动”⁶。民族国家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来自民族主义为群体所做出的政治选择，即拥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及在此国家中自主地行使权力，代表人物为澳大利亚学者伊恩·卡明斯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卡明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一书中，追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所处时期民族运动的态度和理念。他写道：“正像《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宣布的那样，‘工人没有祖国’，欧洲经历了著名的‘人民全盛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在寻求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的时候，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影响要比那种较为短暂的民族范围斗争的影响大得多，他们还是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到那时发生的民族斗争上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显然是对立的。”⁷ 可见，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愿望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总是齐头并进，但是他们仍十分重视历史发展中的民族运动，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要同民族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盟关系。“由于人类沿着横向线划分为阶级，又沿着纵向线划分为民族，因此，一定的阶级在特定的情况中的行为几乎不可能不受他们民族环境的特殊性的影响。”⁸ 民族因素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是必然的，“民族自决的事业和农民、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⁹。卡明斯从马克思对波兰民族运动的阐释证明了民族运动对于实现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

¹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9-10.

² (美)迈克尔·赫克特著，韩召颖等译：《遏制民族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³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cknowledgements vi.

⁴ (美)迈克尔·赫克特著，韩召颖等译：《遏制民族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37页。

⁵ (美)迈克尔·赫克特著，韩召颖等译：《遏制民族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⁶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

⁷ (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⁸ (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⁹ (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8页。

的国际运动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或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¹ 民族解放运动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社会抵抗运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民族运动举起了“解放”“自由”“独立”“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的旗帜，使得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末开始成为主要的历史趋势。此外，卡明斯指出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民族独立为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骨架……就经济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和它的资本主义前驱的区别，不仅仅是在于财富和资源的更公平的分配。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显示出它有能力去组织一个更合理的生产体系，这种生产体系有为全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产品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辩证地，注定地是资本主义的继承人，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在它创造的许多事物中，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的制度。”² 可见，从社会形态的历程来看，民族解放运动是民族独立的必要前提，民族独立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先决条件，民族国家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经济领域的不断前进，而经济的发展最终会导向资本主义的终结和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在这一最终阶段人类也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可以说，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解读了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民族-国家”作为新型的社会政治体制，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在新的民族-国家阶段，主权观念进一步发展，现代民主多元政治形成，作为权利集装箱的国家具有高度集权的行政力量。民族-国家的出现，一方面，让民族主义情感、民族认同与国家边界复合起来，另一方面，也会激发消极的、非理性的、极端的民族主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民族主义情感明显战胜了国际主义，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世界秩序改变，整个世界体系广泛的军事化过程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转变成了全球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³ 作为19世纪至今的一种无可抗拒的政治形式，民族-国家的发展必然地与科学技术研究、军事工业化、武器开发等结合起来。然而，军事力量的极大发展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是对立、威胁和恐惧，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开一个在不远的将来笼罩着毁灭无遗的阴影的世界呢？吉登斯的答案是，“将社会改革的物质可能性与乌托邦要素结合起来”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原理，对军事工业化情境中的武装力量进行控制，进而“规范地建构（乌托邦式）‘美好社会’模型”⁵。

五、社会文化视角

这一视角的民族理论家将民族状况与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的有效行使，不能仅依靠权力组织和暴力机构，更要依赖自身特定的文化结构来聚合人民。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要通过民族主义来黏合工业化之前相对离散的社会文化，进而通过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传播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及忠诚，并使其持续地传播，代表人物为同是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的特里·伊格尔顿和斯图亚特·霍尔。

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指出，“民族身份对政治的影响往往大于阶级”⁶，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都是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头羊，他们所倡导的

¹ (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

² (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20页。

³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第147页。

⁴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第387页。

⁵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第388页。

⁶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任文科、郑义译：《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革命运动并没有囿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运动，同时也支持各个民族国家的解放与自治。“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声明殖民地人民拥有自决权。……列宁是第一个把握住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的政治理论家。……他坚持认为民族解放并非一种沙文主义情绪而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方式。……‘早在印度独立三十多年前和非洲解放运动开始的四十多年前，（列宁）就已经将反帝民族运动作为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形成了相关的理论。’”¹民族是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群体的一方，应当继续发扬列宁关于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自决权的正确认识，肯定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的积极意义。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作用后，伊格尔顿进一步在《民族主义：反讽与关怀》一文中从自我反讽性入手对民族主义进行解读，他认为，“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就像阶级。去拥有它，去感受它，是终结它的唯一方法。……民族主义如同阶级，似乎也陷入了一种不可能的反讽之中。至少对卡尔·马克思来说，人们有时会忘记社会阶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形式……他相信要去除这种异化，我们必须走过阶级，而不是绕过阶级，必须以某种方式彻底穿过它，并从它的另一端走出来”²。伊格尔顿将民族主义与阶级进行了类比，认为民族主义像阶级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自我反讽性，这种反讽性在他的解读下从文学修辞走向了哲学运用，要克服这种自我反讽性，只有认同并参与其中，因为主体无法直接摆脱或跳过阶级或民族的范畴，所以消除阶级分化和民族划分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其中的历史组成部分，合理、科学地“穿越”这两个范畴。“社会阶级如同殖民主义，是一种关系，一旦那些政治关系被消除，一个阶级或民族就不能作为某种共同的自我认同的实体而存在。”³可见，在伊格尔顿看来，只有通过民族主义才能实现国际主义，最终的无阶级、无民族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只有通过阶级的、民族的社会才能够达至，“所以任何解放政治必须从特殊性开始，但是也必须跨越特殊性”⁴。

霍尔以《文化认同与移民社群》《族性：认同和差异》等文章构架了自己对民族、族性、认同的文化解释体系，他指出，民族认同是一种透过大众文化的制作与再制作，要由文化与历史的“对话”来确定。他把认同与社会文化的一般状况相结合，指出文本要“重读”，意义要“重建”，因为每一个“文本”的“叙事”都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在全球化的世界当中，民族认同处于一种既被侵蚀又被加强的矛盾状况，全球大众文化“一方面放任差异，另一方面用更庞大的框架体系来吸纳、征服差异文化”⁵。他写道：“认同不像我们所想的毫无疑义，可以一目了然。与其将认同视为一种以新的文化习俗为代表的已完成事实，不如将它视为一种‘制作’，一种一直处于进行中永远没有杀青之时，并且由内部自我调整（非由外部塑造）的演出。”⁶在霍尔看来，认同并非不可改变的，而是不稳定的身份识别方式。此外，霍尔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和“新族性认同”理论，他指出，那些从殖民地迁移到核心发达宗主国的移民，其实踏上了一条走向后殖民、后奴隶时代的不归路，他们离开故乡的迁徙使得他们切断了与原初母体的脐带，而在所迁入的核心发达国家又体验了另一种边缘、分裂和异化，因此，移民实则是一种双重边缘化的过程。这种双重边缘化同时也赋予了移民主体独特的、新的认同体验，产生了基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族性政治，他这样写道：“身份不在于发现过去，而在于构建未来”⁷；

¹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任文科、郑义译：《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214-215页。

² Terry Eagleton, 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 Said,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 23.

³ Terry Eagleton, 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 Said,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 28.

⁴ Terry Eagleton, 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 Said,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 30.

⁵ 陶家俊：《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⁶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and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22.

⁷ Stuart Hall, "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 *New Left Review*, 1/209, January-February, 1995, p. 14.

“我们正开始看到这样一个新族性的概念的建设：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参与而不是抑制差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新族裔身份的文化构建”¹。

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整体特征、价值意义及其局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继承、发展、创新，也包括一定程度的批判。虽然，他们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来理解民族问题，但都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思想特点，其整体特征有四：

1. 现代主义的认识方法。在当代西方民族范畴的研究领域，主导的解释范式包括现代主义、原生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其中尤以现代主义为核心并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家基本都归属于此。他们普遍相信民族范畴所固有的现代性本质，并共享这一信念，虽然他们对民族相关概念的研究视角有诸多差异，但都将其与实际的社会发展过程相关联，构架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

2. 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在 20 世纪中后期成长起来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普遍经历或部分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法西斯运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历史性事件，他们的理论深受国际政治和世界局势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历史带入感和使命感。他们把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看成展开的、活生生的书本进行分析解读，对现代人类所历经的重大事件中的民族因素做出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认识。

3. 辩证批判的分析态度。民族作为社会群体单位，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叙事，因此不仅要统摄纵向的历时性还要兼论横向的共时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将两者关联起来，从辩证认识和理性批判的角度出发，不仅展开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理性认识民族主义非理性的一面，客观看待民族诉求、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在现代社会产生的两面性作用，也在此基础上认识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些不符合现状的、稍显过时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基于真实状况的发展和超越，打破以往囿于阶级分析和仅将民族作为资产阶级产物的传统认知，符合民族范畴的现代发展状况，在某些方面发展和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4. 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预设。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总是抱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希望借由民族斗争来推动民主、解放进程。这里有必要区分其两种诉求，一种明确提出或暗示了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转向，另一种则仅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但并未阐述所要达至的理想社会。他们从自身所处的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基本情况出发，其理论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特定现实问题而建构，因此其中的一些观点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和地域限定性。

总体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其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时代性、多元性与包容性。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²，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注重理论与时代的真切联系，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时代性价值。其理论解析既讲求宏观分析的历史纵深和时势交互，又具有微观分析的逻辑脉络和翔实佐证，形成了不同研究视角的思想观点，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多元性价值。而在具体的理论分析中，各种视角以及不同理论家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许多针锋相对的批判言论，这种对民族问题的不断探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价值。

¹ Stuart Hall, “New Ethnicit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447-448.

²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429 页。

另一方面，其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前沿性、开放性与创新性。作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民族范畴一直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注焦点，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承袭与发展，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理论融合在一个解释框架内，进行具有创造性、合理性、有效性的理论构架，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永恒发展的前沿性价值。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在理论观点、研究路径等方面进行独具特色的创新和发展，通过新的实践继续延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价值。他们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积极、能动、辩证地认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其现代主义的认识方法、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辩证批判的分析态度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预设的整体特征是跟随时代发展所不断进行的创造和完善，对于当代民族问题的解答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平等、解放有创新性价值。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²“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是这一精神的践行者。

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具有多重正向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理论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主要是从其处于的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现实出发，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与民族范畴之间的特定问题而建构的，因此其理论方法有着必然的对象限定性和地域特殊性。直接的后果就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由于受到其理论家自身的身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身所处的环境——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以及想要达成的目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的约束而受到了限制。在超出发达资本主义的范畴，其理论就略显无力。虽然许多代表性学者也详细探讨了如何在边缘不发达的民族区域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但仍无法避免地表现出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所处帝国的地域局限性以及现行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追求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而导致的理论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出发，探讨历史运动的民族主体问题，分析民族与阶级的地位，阐释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及历史作用。然而，在具体的某些理论探索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家以“修正”“批判”的角度进行创新性解读，剖析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社会中对民族问题解释的某些忽略和缺陷，比如霍布斯鲍姆认为列宁式民族自决论无法为21世纪提供解决办法，奈恩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的阐释上是“缺失”的，赫克特在对群体认同的分析中将民族主体放在阶级主体之前，卡明斯质疑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欧洲中心论者等，表现出他们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相关论述，低估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张力。因此，在看待、评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多种研究视角时，我们既要肯定和发展其理论探索精神，又要从其理论模式中走出来，结合实际状况，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在地的民族理论。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相比，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仍有许多局限，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实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理论的延伸，为我们理解现代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¹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

² 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

³ 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页。

【论 文】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三大争论”及评析¹

吕秀彬²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经常被视为处在“艰难的对话”之中。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更看重国际主义的跨民族的横向阶级区分，认为民族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暂时产物。但在实践中，他们又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助力。从20世纪初到当代，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理论一共产生过三次比较大的争论，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系统性的民族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为民族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在梳理国外学界三大争论的基础上，试图重新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揭橥他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并归纳出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四大支柱。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国外学界；三大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从20世纪初一直到今天依旧是国外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究其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变动不居的，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具有危险性、破坏性和排他性的理论，但又认可它能够用来推进国际主义事业，因此，他们在对待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灵活性一直是贯穿始终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常常散见于大量的书籍、文章、信件、宣言和各种声明之中，因而可以说他们并没有留下系统的、全面的论述，也没有给民族或民族主义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些都让这份暧昧的遗产的讨论空间增大了。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有无系统性民族主义观点的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系统性的民族主义观点一直是国外学界争论的焦点，总结来说形成了如下三个派别：第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民族主义思想，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理论中并没有包含民族认同的内容；第二，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民族主义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不过是革命策略罢了；第三，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系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建构出了一个逻辑体系。这一部分，我们将会对这三种观点进行逐一的探析。汤姆·奈恩（Tom Nair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民族主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历史失败。它可能也有其他的问题，有些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论……然而，没有一个比民族主义问题更重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³ 这类观点在国外学术界比较常见，反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人涉及。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入手进行攻击，尤其是冷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面临一定政治困境，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遗留的问题，让这些学者将原因追溯到马克思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低估，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甚至将共产主义的历史称作“讦告”⁴。这事实上制造了一种混乱，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思潮和现实来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内容与动机。安德里亚·格拉齐奥西（Andrea Graziosi）就曾指出：“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们之间有许

¹ 本文刊载于《世界民族》2021年第4期，第1-14页。

²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³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 329.

⁴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p. IX.

多互相借用和各种各样的混合，而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¹

非马克思主义者唐纳德·N·莱文 (Donald N. Levine)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拒绝民族主义的²，在他看来《共产党宣言》中很明确地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民族特征”，“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³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过同情，“但可以公平地说，马克思在他对未来的预测中几乎没有给民族主义情绪留下空间”⁴。莱文引用了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的话作为结论：“马克思系统地低估了民族主义、宗教和种族团结等非理性力量的影响”⁵，因而，马克思展现出一种对民族问题解释的“特殊的无能性”⁶。对此，凯文·B·安德森 (Kevin B. Anderson) 评价道：“虽然莱文对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批评，但由于没有更多地吸收马克思关于这些相关主题的著作，这种批判被削弱了。”⁷ 安德森在其著作《边缘地带的马克思：论民族主义、族群和非西方社会》(2010) 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作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⁸。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有民族主义思想。罗纳尔多·蒙克 (Ronaldo Munck) 试图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更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处在一种艰难的对话状态⁹，并断言：“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民族主义理论”¹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声称是一种为人类解放谋划道路的意识形态，但却在理解民族主义上有着“独特的困难”¹¹，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现象的研究贡献甚微。后马克思主义者厄内斯特·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也认为马克思不认可“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和不可还原性 (irreducibility)”¹²。埃里克·本纳 (Erica Benner) 认为如果不承认已经成为事实的民族主义，将会让马克思主义丧失解释力。¹³她在《现实存在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后共产主义视角》重新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区分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反对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观上的无知。¹⁴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承认，但被看作是“不系统”“不完

¹ Andrea Graziosi, “Commun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Silvio Pons, Stephen A.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ommunism* (volume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49.

² 赵凯荣持有与莱文相似的观点，认为对马克思来说，民族问题不重要，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单一民族的消亡对马克思而言并没有什么值得伤感的。参见赵凯荣：《马克思主义：如何面对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相关思想的分歧及其当代意义》，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³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⁴ Donald N. Levine,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27.

⁵ Donald N. Levine,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29.

⁶ Donald N. Levine,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29.

⁷ Kevin B. Anderson, “Levine on the Marxian Tradition: From Idealist Roots to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42,

⁸ 详见 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在该书中安德森对马克思、恩格斯散落在书信、文章等角落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按照不同民族问题和不同时间段进行了分类，他重点分析了波兰、爱尔兰、俄国的民族问题，除此之外，还关注了犹太人、美国黑人等种族问题和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东方社会的殖民问题，并将马克思视作“全球理论家”。

⁹ 参见张三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困难对话论”评析》(上)，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3期；张三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困难对话论”评析》(下)，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4期。张三南在这两篇文章中讨论了蒙克的“困难对话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是非决然对立的，他从人类解放这一“长时段和大理论”视角以及无产阶级对待民族主义的“两重性”入手进行分析，指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可以实现良性互动。

¹⁰ 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1986, p. 2.

¹¹ 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1986, p. 1.

¹² (美) 麦克·戴维斯著，罗雪芳译：《马克思遗失的理论——民族主义的政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1期。

¹³ (美) 麦克·戴维斯著，罗雪芳译：《马克思遗失的理论——民族主义的政治》，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1期。

¹⁴ Erica Benner,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s: A Post-Communist View from Marx and Enge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善”“不连贯”的政治革命策略。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指出：“马克思既没有提出系统的民族理论，也没有对‘民族’概念作出准确的解释，更没有为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提供一个总体的政治策略。”¹因此，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部分文本都是与具体事件相关的政治声明。对此，韩国学者林志弦（Jie-Hyun Lim）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低估，“马克思对实际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述也不能纯粹从政治角度来分析”²。贺拉斯·B·戴维斯（Horace B. Davis）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是不稳定的，“当民族主义情绪被纳入一个有价值的事业中时，它就成了一个有利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当民族主义情绪阻碍进步时，它就会被当作‘偏见’而不予理会，或者加上‘狭隘’这样的修饰语。”³。例如，马克思在讨论英、法工农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态度时，“无论英国无产者还是法国无产者都充满着崇高的民族感情，不过他们或多或少摆脱了两国农民所固有的陈旧的民族偏见。”⁴米哈尔·卡斯普扎克（Michal Kasprzak）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波兰的论述呈现出“矛盾性”。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心全意支持波兰独立，但到了50年代，恩格斯强烈反对波兰独立，认为其注定被俄国和德国吞并，60年代后恩格斯再次呼吁波兰独立。“这种分歧甚至矛盾的观点只会在他们的学生和敌人之间引起混乱。”⁵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也被部分学者用一个“框架”含蓄地塑造成一个体系。伊弗雷姆·尼姆尼（Ephraim Nimni）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是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问题的不同解读，但存在一个“潜在的范式”，他称之为三个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即进化论；生产力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两者的衍生范畴，具体案例分析中的欧洲中心主义⁶。尼姆尼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法国为蓝本，坚持对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偏爱，如果民族主义运动代表着生产力的更高阶段，用来废除封建制度，“那么民族主义运动作为社会进步变革的‘工具’值得支持”，但如果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在一个弱小文化群体中，“民族主义运动就变成了一种‘退步’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不能构成‘适当的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应该被更‘进步’和‘有活力’的民族同化而消失”⁷。林志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即唯物史观——资本中心论；理论联系——帝国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多元线性观；现象分析——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新闻类作品⁸。与洛维的政治主义和尼姆尼的经济主义不同的是，林志弦将二者结合起来，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入手进行考察，他认为：“从形式经济角度看是错误的，但从普遍历史观点来看可能是正确的。”⁹民族主义不能单纯以“资本中心”来判断，这样会低估了欠发达国家民族主义的潜力。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因为“还原论”（reductionism）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在分析爱尔兰民族问题时已经成功地摆脱了。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做出如下析：第一，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前后矛盾性？诚如卡斯普扎克所言，“马克

¹ Michael Löwy, “Marxist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New Left Review*, Vol. 96, No. 4, 1976.

² Jie-Hyun Lim, “Marx’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Irish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6, No. 2, 1992.

³ Horace B. Davis, “Nations, Colonies and Social Classes: The Position of Marx and Engels”, *Science & Society*, Vol. 29, No. 1, 1965.

⁴ 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3页。

⁵ 详见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23.

⁶ Ephraim Nimni,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3, No. 3, 1989.

⁷ Ephraim Nimni,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3, No. 3, 1989.

⁸ Jie-Hyun Lim, “Marx’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Irish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6, No. 2, 1992.

⁹ Jie-Hyun Lim, “Marx’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Irish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6, No. 2, 1992.

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是僵化的，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演变的”¹。1848年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应对的是德国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国家和自由主义的环境，对狭隘、保守和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1848年的“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让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一方面，他们积极利用民族运动达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受激进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做出了一些主观的判断。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重新评估了民族主义力量，修正了民族主义的部分观点，并保持与国际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的平衡。正如费舍尔（V. C. Fišera）等所言就算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理论上的主张或思想连续性，也有一种逻辑和演变反映了作家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态度”²。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对民族主义有不同态度，这是由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多面性”决定的。³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曾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最矛盾的政治术语，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内涵；‘民族主义’这个词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和中性的。”⁴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很容易就会受到其傲慢和排外倾向的影响，因此它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思想究竟应当从何种维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没有着重强调民族主义这种情感或意识形态，甚至一度认为它作为资本主义的暂时产物将会消失，但他们并没有小觑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本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远不是民族主义的结构或经济先决条件，而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战略所具有的极强的吸引力和革命性，它为通往共产主义提供了重要支撑⁵。诚如阿格拉瓦尔（N. N. Agrwal）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问题，“同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都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利益出发的。”⁶这是我们理解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前提。⁷

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民族主义盛行的19世纪，受到民族主义力量的影响不足为奇，但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呢？国外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其焦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青年恩格斯的“非历史民族”（Geschichtlosen Völker）理论，以及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没有统一的态度？

国外部分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视为“披着社会主义服装的民族主义者”⁸。利亚·格林菲

¹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 17.

² V. C. Fišera, and G Minnerup,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Eric Cahm and Vladimir Claude Fišera (ed.)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Volume One), Nottingham: Spokesman, 1978, p. 6.

³ 参见（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所谓中性或温和的民族主义又被称作“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在培养民族情感时，不忽视民族主义理念必须兼顾的其他人类价值。

⁴ 详见王杰、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⁵ Erica Benner,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 A Post-Communist View from Marx and Engels*.

⁶ N. N. Agrwal, “Marx and Engel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3, 1955.

⁷ 马戎等持有与阿格拉瓦尔相似的观点，他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始至终都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分析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问题，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详见马戎：《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载《中国学术》（总第32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6-219页。杨天虎、陈燕认为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民族主义问题的基点。详见杨天虎、陈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民族主义观的承续与发展——以爱尔兰问题为中心的考察》，载《求索》2013年第9期。

⁸ 参考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尔德 (Liah Greenfeld) 就认为马克思生长在德国浪漫主义时代, “他完全继承了民族主义的态度, 但是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德国沙文主义对他来说并不陌生”¹。伯特伦·沃尔夫 (Bertram Wolfe)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革命民族主义者, 因为“从 1848 年起, 无论大事小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倾向于从统一的大德国的角度来判断其他国家的权利以及欧洲的民族运动和革命”²。这些都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民族主义的倾向。本纳则坚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 并反对民族沙文主义, 但“称他们为民族主义者是没有道理的夸大”³。而贺拉斯·B·戴维斯则持一种“无意识的民族主义”⁴观点, 即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被“放逐”, 因此不受民族主义倾向影响, 但他们在潜意识里还是称赞德国。

为何马克思、恩格斯会被视为“民族主义者”呢? 罗伯特·韦尔 (Robert X. Ware) 分析其原因时说: “人们很容易认为, 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某些较小或‘欠发达’民族的轻蔑甚至鄙视的言论, 他们对民族主义几乎没有耐心。当然, 一个民族主义者并不一定要赞扬每一个民族或民族运动, 但马克思, 甚至恩格斯更是如此, 对许多有抱负的民族特别贬损, 对民族压迫似乎毫不关心。”⁵ 恩格斯在分析“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时, 将斯拉夫民族视为“非历史的、反革命的、毫无生命力的民族”⁶, 他认为像斯拉夫民族这样反动又没有生命力的民族是“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 是没有生命力的, 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⁷ 它们的命运只能是“革命恐怖主义”⁸。国外学界对此有三种态度: 一是, “非历史民族”理论是恩格斯受到激进民族主义影响而产生的理论, 因此, 应当将他看作“德国民族主义者”; 二是, “非历史民族”理论与马克思无关, 所罗门·弗兰克·布鲁姆 (Solomon Frank Bloom) 曾指出马克思“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甚至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⁹, 恩佐·特拉维索 (Enzo Traverso) 和洛维也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同意或不同意 (或不愿意采取) 这一理论: 事实是他没有在其著作中使用它”¹⁰。三是, 将马克思、恩格斯一同视作“民族主义者”,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密切协作、共同革命工作的情况下, 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会有分歧, 这是不可想象的”¹¹。

尼姆尼坚持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民族主义者”, 因为他们都对弱小民族“不耐烦、不宽容”, 例如“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 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¹²; “西班牙人已经退化了。但退化了的西班牙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p. 23-24.

¹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Two Forces or One?” *Survey*, Vol. 29, No.3, 1985.

² Bertram D. Wolfe,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Marx and Engels”,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17, No. 4, 1958.

³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 24.

⁴ 详见 Horace B. Davis, *Nationalism & Socialism: Marxist and Labor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to 1917*,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p. 18.

⁵ Robert X.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30.

⁶ 文中, 斯拉夫民族指俄罗斯人、波兰人之外没有建立自己国家、人口规模较小的分支, 分布在东欧、东南欧地区, 比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等著作中论及斯拉夫民族问题。

⁷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第 328 页。

⁸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第 339 页。

⁹ Solomon Frank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Implications in the Work of Karl Mar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185.

¹⁰ Enzo Traverso and Michael Lowy,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ritique of Nimni's Interpreta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4, No. 2, 1990.

¹¹ Ephraim Nimni,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¹²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608 页。

牙人，即墨西哥人，也是一种典型。西班牙人的种种恶习、吹牛、空谈和唐·吉珂德精神在他们那里都自乘了三次……”¹；“贝都英人的斗争是无望之举……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²；“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粗暴和海盗式的古诺曼人的性格”³。尼姆尼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僵化的、教条化的社会进化普遍规律规定的结果，它定义了“现代民族”应该存在的历史状态，并在默认的情况下，以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标准来判定“落后民族”。特拉维索和洛维不同意尼姆尼的观点，他们认为尼姆尼指出的马克思对中国人、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的负面评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少数民族’……西班牙人在地理和历史都不是一个‘小的’或‘非西方的’民族”⁴。此外，马克思非但没有“贬损”中国，还正确预测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关系⁵。他们认为马克思确实在19世纪中叶对斯拉夫民族作出过一些负面评价，但绝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进化论”，这是因为斯拉夫民族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表现出了强烈的亲俄倾向⁶，而沙皇俄国在当时是反革命势力的堡垒，马克思担心泛民族主义转移无产阶级革命视野，成为俄国民族沙文主义侵略和吞并的工具⁷。在俄国1858年出现革命的废奴运动后，马克思的负面言辞就完全消失了。

为何恩格斯会得出“非历史民族”的判断呢？乌克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认为这一理论有黑格尔历史观根源，黑格尔曾在《精神哲学》中指出：“一个没有构成国家的民族……严格地说，没有任何历史，像国家崛起之前的民族和其他仍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一样。”⁸黑格尔将这样的民族称呼为“民族的残余”，这样的民族唯一的命运就是服从其他民族，最终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只有那些有自然和精神能力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制度，帮助他们在国内外实现自己意愿的民族才是历史进步的承担者。这些观点都被恩格斯采纳⁹，罗斯多尔斯基对此表示不解，因为它“与恩格斯自己创造的唯物史观相矛盾”¹⁰。黑格尔的观点是明显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意味的，“非历史民族”不是从不断变化的民族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关系中得出民族斗争和民族运动的本质，而是从它过去的历史中寻求“民族生存能力”的标准。罗斯多尔斯基认为恩格斯可能过于强调历史的因素了，而没有给“非历史民族”提供发展的机会¹¹。同时，虽然恩格斯对“非历史民族”有负面评价，但这是因为他想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甚至

¹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2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5页。

² 恩格斯：《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基佐的外交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3页。

³ 恩格斯：《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4页。

⁴ Enzo Traverso and Michael Löwy,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ritique of Nimni’s Interpretation”.

⁵ 参见叶险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叶险明在该文中从多个角度阐明了马克思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完成了对民族中心主义的超越。

⁶ 参见19世纪中叶斯洛伐克革命家卢多维特·斯特（Ludovít Štur）在其著作《斯拉夫王国与未来世界》（*Slavdom and the World of the Future*）中认为俄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斯拉夫民族，将斯拉夫民族比喻成“树杈”，俄国是“树干”，希望斯洛伐克被俄国吞并。

⁷ 详见Kevin B.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pp. 47-50. 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俄国的负面评价（主要见其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方面是俄国的专制性使其成为反革命力量，因而需要对其严肃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屈从于民族中心主义，但以一种单向的、居高临下的方式描写俄国及其人民。

⁸ Hegel,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4, pp. 275-276.

⁹ 详见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2页。恩格斯在一系列描述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文章中，将那些“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的民族称呼为“残存的民族”，认为他们每次都是反革命的狂热代表。

¹⁰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28.

¹¹ 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在当时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民族注定要灭亡”，他认为恩格斯的理论中的矛盾是：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另一方面是，“历史生存能力”问题关系到这些民族的未来。详见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过于“着急”了，他想“废除所有的‘特殊主义’，将欧洲人口融合成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单位……任何威胁……‘集中’而支持‘特殊主义’的东西，都必须被当作反动的和‘反历史’的加以拒绝”¹。

恩格斯正确地分析了19世纪中叶斯拉夫民族文明发展的参差不齐和语言不通的现状，他认为奥地利斯拉夫人要建立民族国家就必须摆脱纯粹农民民族的现状，发展出自身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否则即便是独立了，也会被德国资产阶级窃取果实²。但恩格斯混淆了在语言文化上追求民族团结与进步，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泛斯拉夫主义”与政治上要求俄国通过吞并等手段统一所有斯拉夫人的反动的“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对所有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抱有排斥态度。正如罗斯多尔斯基所言：“1848年及以后的奥地利斯拉夫人决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巨人山脉的统一的斯拉夫国家；相反，他们遵循‘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只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努力。”³ 特拉维索和洛维分析了罗斯多尔斯基的观点，认为斯拉夫的农民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等）有形成自身民族认同和参加革命的意愿，但德国和马扎尔贵族和士绅并不给他们土地改革的机会，反而将他们推向了沙皇俄国的反动阵营⁴。恩格斯没有根据革命现实和阶级状况，而单纯的以“民族生命力”为基础做判断是违背辩证法的。但随着恩格斯摆脱理想主义历史观的束缚之后，他对爱尔兰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芬尼亚运动⁵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因此，“‘非历史民族’的理论看来是完全错误和无用的，但这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一个好理由。”⁶

约翰·霍夫曼（John Hoffman）和恩苏马洛·姆扎拉（Nxumalo Mzala）也认为不应当将这一理论“抽象和固定为民族问题上的某种原则性或纲领性的政策，也不能把马克思钉在还原论的十字架上”⁷，而是应当在一个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全面的评价。在他们看来，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斯拉夫人（例如，捷克人）在其他情况下的民族独立权利，也没有排除如果斯拉夫人与革命斗争认同，他们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生存能力’”⁸。他们指出恩格斯犯了和尼姆尼一样的错误，即将民族地位当作抽象和绝对的东西，而并非将其看作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通过不同的方式自愿融合而出现。恩格斯为何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他们认为恩格斯从唯心主义挣脱出来，在主张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观点时，“这根棍子，就像它曾经那样，被弯曲得太远了”⁹。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面对自己的对手时，必须用一种相当还原的方式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必须将这种抽象的理论和他们运用的具体方式区别开来。

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问题的视野有所不同，国外许多学者，包括贺拉斯·B. 戴维斯、罗斯多尔斯基、沃尔克·康纳（Walker Connor）等认为恩格斯受到民族主义运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33.

¹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29-130.

²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40.

³ Roman Rosdolsky, *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Glasgow: Critique Books, 1987, p. 139.

⁴ Enzo Traverso and Michael Löwy,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ritique of Nimni’s Interpretation”.

⁵ 芬尼亚（Denian）是芬尼兄弟会和爱尔兰共和党兄弟会（IRB）的总称，这一组织从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活动，主张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

⁶ Enzo Traverso and Michael Löwy, “The Marxist Approach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Critique of Nimni’s Interpretation”.

⁷ John Hoffman and Nxumalo Mzala, “Non-Historic Nation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y*, Vol. 54, No. 4, 1990/1991.

⁸ John Hoffman and Nxumalo Mzala, “Non-Historic Nation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y*, Vol. 54, No. 4, 1990/1991.

⁹ John Hoffman and Nxumalo Mzala, “Non-Historic Nation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Science & Society*, Vol. 54, No. 4, 1990/1991.

动的冲击更为直接和明显，恩格斯有一些独有的民族原则，例如“非历史民族”理论等。贺拉斯·B·戴维斯认为：“恩格斯年轻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努力保持国际主义的观点，但他后来曾多次使用民族主义术语。”¹ 康纳就直接指出：“在这两个人中，恩格斯受到民族运动高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² 埃德蒙·威尔逊则认为：“恩格斯的伴侣玛丽·白恩士是一个极端爱尔兰爱国主义者，这刺激了青年恩格斯的革命热情。”³ 与恩格斯相比，马克思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深，在处理民族主义问题时能保持相对客观。青年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探索虽然曾出现失误，但也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珍贵探索，到后来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⁴一文中恩格斯已经能熟练地运用民族原则分析民族主义问题，因此，将恩格斯视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是有失公允的，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最终都是为了消除民族偏见、不平等和各种制度化障碍。总之，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往往需要从一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尽量避免从他们的某段语句或者某种观点入手，不要忽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的考察，避免得出“盲人摸象”一般的结论。

国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引申出如下问题，我们展开进一步剖析：第一，如何评价青年恩格斯的“非历史民族”理论？⁵ 笔者认为，要将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放在“总的历史背景下”全面评价，虽然恩格斯曾有绝对化和抽象化的失误，对民族主义运动过于理想主义，对沙皇俄国的反动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但应该看到，尤其以他对待爱尔兰“芬尼亚民族运动”为证，他思想中包含了辩证性，修正了当初的抽象的理解，并放弃了“非历史民族”的观点。第二，如何看待青年恩格斯所受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19世纪欧洲两股民族主义力量，“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代表的政治民族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以德国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民族的哲学基础是‘整体主义’（holisme）”⁶。恩格斯将法国的启蒙主义与德国的排他民族主义杂糅在一起，加上受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的“革命恐怖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度激进主义占据上风，表现出狂热、进步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可以理解的，青年恩格斯的激进情绪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和与赫斯分道扬镳之后逐渐消失殆尽⁷。第三，如何看待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差异？这可能与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更强有关，他迫于普鲁士当局的压迫和驱逐而放弃了普鲁士国籍，以“世界居民”自称，虽然后来马克思曾多次想要恢复其国籍，但并未成功。据此，也不宜夸大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在革命热情中的价值超越一切意见上的分歧。

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关系的争论

正如康纳所说“马克思主义”（倡导“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哲学上是不相容的，

¹ Horace B. Davis, *Nationalism & Socialism: Marxist and Labor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to 1917*, p. 46.

²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

³ (美)埃德蒙·威尔逊著，刘森尧译：《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3-124页。

⁴ 文中恩格斯既批判了普鲁东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虚无主义，也批判了波拿巴集团反动的民族原则。详见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0-183页。

⁵ 除了罗斯多尔斯基“黑格尔根源论”、安德森等的“忌惮俄国论”之外，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见解。参见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王希恩引用列宁的话语，对恩格斯将波兰人视为“非历史民族”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这个问题只“具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不能绝对化。又见张炯：《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载《现代哲学》2020年第1期。张炯认为恩格斯对两种“民族主义”传统，即文化和政治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杂糅，他只看到了政治民族的历史，继而以政治民族的历史强行覆盖文化民族的历史。张炯认为至少在1848年恩格斯身上有“普世主义”与“排他主义”两种传统，这两种情感的杂糅也是重要原因。

⁶ (法)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三联书店2005年，第9页。

⁷ 参见张炯：《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载《现代哲学》2020年第1期。

因为民族主义从纵向上将人们划分为“不同族群”，而国际主义建立在“跨民族群体的横向阶级区分上”¹。国外学界就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是否相容展开了一场争论。

康纳认为民族主义者坚持民族意识要比阶级意识更为忠诚和强大，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民族无产阶级相互连接为一个纽带，比共同的民族地位更重要，历史会证明国际主义将最终战胜民族主义。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²。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大卫·费利克（David Felix）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指出：“马克思的国际战略不仅容忍而且有意识地使用民族主义，这并不奇怪。任何具体的决定都取决于他如何在他的总体计划‘国际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定位和管理民族主义的某一方面。”³本纳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意识到民族主义潜在的负面影响，并试图对他们发出警告，而并非排斥民族主义，她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与民族性相关的某些人口和文化特征的跨国界的韧性。”⁴韦尔也指出：“马克思当然是国际主义者，但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民族作为无产阶级的祖国是重要的。”⁵

可以说，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诞生于同一时代，才让两者之间虽然在哲学假设上是矛盾的但依旧能够产生亲密的互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性质让马克思主义者将民族主义视为历史发展中的敌对力量，这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比较常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虚幻的共同体”，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再加上普鲁士政府的审查制度对新闻自由的限制让青年马克思十分排斥民族主义；第二，马克思对李斯特保护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由贸易⁶；第三，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哲学”，对德国“精神”极度夸大，将自己脱离现实的纯思辨的学说赋予了“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价值，炫耀自己的学说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⁷。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消极的民族主义持一种排斥态度，不过“这仅仅是这两种主义历史关系的一部分，也许是最不耐人寻味的部分”⁸。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东方民族国家（中国、印度等）逐渐崛起的革命民族主义力量，这些民族可能点燃欧洲革命的火药桶。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逐渐了解和适应了这个世界，并通过制定策略，将民族主义转而为国际主义服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爱尔兰的“芬尼亚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运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是“下层阶级的运动”⁹，他支持英国无产阶级与爱尔兰民族主义力量合作。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更深入地研究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认为民族独立运动必须在更广阔的国际主义视野中展开，并批判了普鲁东、巴枯宁和拉萨尔等人的狭隘观点和民族局限性。

¹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

²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

³ David Felix, *Marx as Politicia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55.

⁴ Erica Benner,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s: A Post-Communist View from Marx and Engels*, p. 73.

⁵ Robert X.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22.

⁶ 参见 Roman Szpori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0-42. 罗曼·斯波鲁克在该书中比较了马克思与李斯特的思想，分析了李斯特的保守经济民族主义，他认为事实上马克思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比他在民族主义方面写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见该书第1页。

⁷ 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⁸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7.

⁹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4页。

韦尔指出：“所谓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不相容，是对两个相当模糊的‘主义’的简单混淆。”¹民族主义是指促进和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而国际主义是为不同的民族的人民工作，或者说是促进跨国家的合作。因此，民族主义只能是与“反民族主义”相对的，而不能把它与“国际主义”视为格格不入的范畴。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也是相辅相成的，人们往往共同致力于这两种运动，在国际合作的同时也不会否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罗曼·斯波鲁克（Roman Szporluk）认为要解决“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必须首先承认民族主义的力量：“事实上，当共产主义打败了敌对学说时，它的胜利至少要归功于采纳了部分民族主义的原则，以及它本身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事实。”²可见，民族主义是促成国际主义必不可少的一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也有着相似性，例如，二者都植根于启蒙运动后的“进步话语”、都给流离失所者归属感、都利用了普遍自由的言论等。³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洛维将马克思、恩格斯归为“反民族主义”的，是因为他们拒绝将民族视为一个“无差别”的共同体，他们的最高忠诚不是任何民族，而是国际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和目标（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时，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因此物质生产力还是首要因素，与之相对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都被置于上层建筑之内，民族主义被解释为一种历史现象，只是随着封建主义的消亡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才得以存在，它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洛维指出经济主义和线性进步幻想（从启蒙时期开始）⁴，让马克思、恩格斯乐观地认为民族主义将会不可避免地很快衰落。由于忽视了“非阶级”形式（民族、种族或性别）的压迫，他们低估了民族解放的力量⁵。卡斯普扎克也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不那么强调民族主义，一方面与他有反民族主义倾向有关，另一方面，写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不仅会承认民族主义是日益强大的力量，而且还意味着阶级和民族归属之间的斗争⁶。除此之外，洛维还认为虽然国际主义是基于具体、客观和物质条件的政治力量，但它“忽略了不同民族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不平衡发展的结果”⁷。他援引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话指出：“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根本不是建立在他们的条件、任务和方法的同一性的基础上。”⁸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发展最终是趋向“普遍主义”的，但他们也从未忽视“差异性”的存在，同时肯定民族主义对民族解放的巨大作用。正如韦尔所言：“民族和阶级，一个方面的提升可能会与另一个方面的提升产生冲突，但它们是可能兼容的。”⁹民族联盟与阶级之间有着诸多相互支持的政治意志，如果国际无产阶级更亲密的合作的话，也需要平等和独立的民族，正如恩格斯所言：“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¹⁰

¹ Robert X.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31.

² Roman Szpor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

³ 参考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 21.

⁴ 康纳也认为马克思过于看重经济因果关系，而忽视了民族范畴，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著作中的术语混乱，民族有时被指为国家总人口，有时被看作民族群体，还被认为是指代公民的基本法律概念。参见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9.

⁵ Michael Löwy, *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57.

⁶ Michal Kasprzak,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rxist Nationality Policy from Marx and Engels to Lenin and the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of Polan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p. 21.

⁷ Michael Löwy, *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55.

⁸ Michael Löwy, *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57.

⁹ Robert X. Ware, *Marx on Emancipation and Socialist Goals Retrieving Marx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25.

¹⁰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

阶级并不是区分社会群体的唯一方式，民族、种族和性别等维度都存在广泛的社会差异。很显然，用琼·考克斯（Joan Cocks）的话来说：“我们可以把对大规模的、非个人的〔普遍的〕历史力量的认识与对特殊性和差异性的欣赏结合起来。”¹ 恩格斯曾指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²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还对波斯、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曾总结过马克思对印度和爱尔兰民族的不同分析，他指出，马克思观察到英国将爱尔兰农业产业的盈余转移到本国用于扩大工业生产，并严厉地指责英国的剥削使得爱尔兰陷入极度贫困³。在分析英国对印度的剥削时马克思指出：“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⁴ 正因世界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和残酷性，无产阶级面临着共同的剥削，有着一致的利益诉求，因此他们能够形成“国际联合体”。

国外学界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展开的系列争论，推导出如下问题，让我们略做概括：第一，如何看待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性？“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在实践过程中不像哲学理论中划分得那样绝对，是相互影响、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因此，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应当杜绝形而上学的单一划分，而要用辩证思维来审视。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革命年代，二者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界限，他们一方面观察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审慎地规避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出现，同时又利用民族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助力。第二，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世界主义思想，也称作国际主义思想，其理论内核就是普遍主义，但要在各民族国家获得民族解放之后，无产阶级才能联合起来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自启蒙时期以来的“普遍进步”的思想，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民族主义问题，他们希望世界各民族实现自身的独立与解放，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第三，如何看待无产阶级的差异性？无产阶级也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各国无产阶级也具有自身的特性。马克思曾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⁵。总之，无产阶级各具民族特性，又统一在革命斗争中。

四、结语：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归纳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理论的三大争论可以被总结为四个问题。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是非系统的、武断的还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第二，恩格斯的“非历史民族”理论究竟是否能推导出他是民族沙文主义者；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之间是否有分歧；第四，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是否存在“艰难的对话”。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进一步阐述如次。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中论述了三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其一，批判消极的民族主义，包括对法国和德国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批判，对德国保守的、自私自利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傲慢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斯拉夫民族反动的“泛民族主义”运动的批判⁶；其二，肯定积极的、革命的民族主义，

第 261 页。

¹ Joan Cocks, “Touché! Marx 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11, No. 2, 1997.

²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第 410 页。

³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and Internation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52, No. 3, 2000.

⁴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584 页。

⁵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王国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90 页。

⁶ 参见冯建勇：《民族原则如何影响国家疆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的阐释》，载《世界民族》，2020

包括对波兰 1846 年、1863 年等多次民族起义的支持，对爱尔兰芬尼亚运动的肯定，以及对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声援等；其三，兼顾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策略，“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¹，在政治上是“国家体系范围”，但经济上是“世界市场范围”。马克思、恩格斯意思是要先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阶级斗争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才能实现民族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不同的民族主义采取不同的立场，所以会给人一种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非系统、不连贯的错觉，但他们的一贯立场是利用民族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事业服务。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两种形态。国外学界讨论了两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其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充斥着民族主义的时代，不可能不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利用革命性的民族主义的力量为无产阶级国际战略服务，并反对德国保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侵略扩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德国民族哲学在世界上处于的领先地位，与鲍威尔兄弟将思辨哲学夸耀为世界哲学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客观评价德国哲学，马克思认为德国是一个哲学民族，恩格斯也认为德国是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并夸赞德国人淳朴的道德²。但他们坚持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³。虽然青年恩格斯在分析斯拉夫民族问题时曾有失误，但从整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为促进世界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差异中寻求同一”。客观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整个革命时代中，相对更看重阶级（经济为依托）的力量，因此，有些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和这种思潮产生的背景环境。但国外学界的一些观点往往夸大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思想的“普遍性”。“没有绝对的国际主义，也没有绝对的民族主义”⁴，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⁵，全球各民族的差异性如此之大，即使要形成国际联合也一定会有“差异性”。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将“博爱、自由、平等”等西方“普世共和”的思想当作全人类的价值追求，他们要追求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是“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原则”，“除了政治平等的要求”，还包括“社会平等的要求……”⁶。

如上三大争论，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策略的灵活性，并根据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现实性、复杂性和危险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自发力量也曾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甚至青年恩格斯一度被它的激进力量所影响，因此后续他们对待民族主义十分的慎重，避免被它的消极力量反噬。他们深刻领悟了革命性的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于是利用民族自发力量来为阶级自觉力量服务，推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世界历史的形成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暴力作为一种“恶”的力量虽然在人道主义上要受到批判，但它对民族融合产生了客观积极作用，用普遍化的力量来消解其特殊性，因此民族主义只是历史的产物终将被世界共产主义所取代，最终将随着人类解放的实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将成为归宿。由此，我们能够比较系统地总结出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方法论的四大支柱，分别是：普遍进步的世界历史进程、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策略主张、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广泛动员、普

年第 4 期。

¹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438 页。

² 详见陈锐：《马克思主义对德国民族性的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 年第 5 期。

³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257 页。

⁴ 郭树勇：《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 年第 12 期。

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0 页。

⁶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庆祝 1792 年 9 月 22 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662、667 页。

遍解放的最终目的。

第一，普遍进步的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进步哲学，它闪耀着“世界历史”思想的光芒，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叙事逻辑中不难看出“进步—痛苦”哲学的思维脉络，他们一直非常重视“暴力”¹所带来的客观进步意义。在处理斯拉夫民族问题时，恩格斯权衡了民族问题中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由于过于看重“有生命力”的民族融合“残余”民族的进步历史作用，而忽视了弱小民族的生存价值。不过，在后续处理波兰、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时，两者之间达到了平衡。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如何对待“痛苦”²，正如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和布莱恩·麦基（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所言：“马克思试图理解人类的冲突、痛苦和缺乏理解是如何植根于生活的物质条件的，特别是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方式。”³民族主义力量催生的“民族自决”是与阶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匹配的，不能违背历史规律强行进行民族融合，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一切私有制后，民族大融合才可能实现，那时才会消除掉一切民族压迫的痛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第二，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的策略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包括“两个联合”，即“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自由人联合体”，它表征“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双重维度，在他们看来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的前提，阶级解放又是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工人没有祖国”⁴是指理性看待民族主义中所蕴含的危险成分，不要受到狭隘的、阴暗的民族利己主义影响。实际上，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各国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上升为民族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建立起自己的政党，消灭一切阶级对立，进而形成联合的力量，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就像洛维所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只有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不再是民族、具有共同的世界历史利益的普世阶级，才能建立一个能够克服民族差异的普遍社会。”⁵总之，无产阶级的民族性就是世界性，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声援世界上一切受压迫的民族。

第三，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广泛动员。民族主义盛行的19世纪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们致力于利用革命民族主义的力量铲除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实现世界民族的广泛团结。他们判断民族主义运动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切都要服从于革命的利益。革命的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爱尔兰爆发芬尼亚运动时，马克思看到了这一运动的三个特性：一是爱尔兰拥有天然的独立权利，二是这一权利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才能获得；三是扎根于人民群众⁶。他坚定的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成平等自由的联盟……”⁷。总之，广泛的

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多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强调“暴力”（战争、掠夺、殖民等）作为一种“痛苦”的力量所带来的客观上的进步意义。例如，奴隶制虽然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要受到谴责，但它确实推动了世界历史进步，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详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² 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深刻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³ 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A Dialogue between 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 Bath: Ashgrove Press, 1987, p. 90.

⁴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2、50页。

⁵ Michael Löwy, *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 Essay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 7.

⁶ 详见马克思：《1876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06页。之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志尼所领导的民族运动，均以失败告终，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脱离人民。爱尔兰也是如此，之前的民族起义都失败了，是因为领导人民的不是贵族，就是资产者，而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有天主教神甫，而芬尼亚运动是下层阶级的运动。

⁷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41页。

革命动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因为它确保了整个世界的最终普遍解放。

第四，普遍解放的最终目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量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将其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因为它无法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催生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通过贬低其他民族来证明自身的进步性，通过沙文主义的侵略获得私利。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民族平等将无法得到保障，人的先天偶然性将会成为他后天的必然性，民族或种族歧视问题泛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这样的“真正共同体”，当民族国家消亡和阶级对立消失之后，民族主义的情感就会成为“多余”的成分，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都实现了充分的发展，“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呼唤，因此，整个过去的历史只有在这最后的解放中才能被理解”¹。

【论 文】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 19 世纪德法两国“自然疆界论”的剖解²

于逢春、冯建勇³

内容摘要：自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开始，法国历代统治者多以鼓吹与实践“自然疆界论”为己任。同时，德、俄等一些对他国领土野心的强国也利用该理论，主张应以对自己国家安全有利的大山、大河等作为其自然分界线。后来，该理论又披着“民族原则”的外衣，渐渐异化为欧洲大国侵略和霸权的道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层层揭底，深刻剖析，最终使其无所遁形。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疆界论；《萨瓦、尼斯与莱茵》；《波河与莱茵河》

一、引言

早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便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规划》（《Le Grand Dessin》）：“使哈布斯堡王室降低到比利牛斯半岛一个国君的地位，把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赶到亚洲去，重建拜占廷帝国，然后再重画整个欧洲地图。欧洲将分为六个世袭君主国家、五个选举的君主国家和五个共和国。在这一切国家之上，设置一个专门的议政府，负责维护普遍和平并审理国与国之间、国君与国君之间的一切纠纷。基督教国家的这种特种共和国的首脑是教皇，其首相则为法国代表。”⁴在此背景下，亨利四世于 1601 年曾对新征服的比热和布雷斯等地区的居民说了一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话：“既然你们历来都讲法语，你们理应是法兰西王国的臣民。使用西班牙语或德语的地方，我赞成分别留给西班牙和德国，但使用法语的地方应归我所有。”⁵肖忠纯认为这是法国“自然疆界论”的肇端。⁶张世明认为，总体上而言，“亨利四世以及黎利的

¹ 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 *The Philosophy of Marxism: A Dialogue between Leszek Kolakowski and Bryan Magee*, Bath: Ashgrove Press, 1987, p. 90.

² 本文刊载于《中州学刊》2014 年第 1 期。

³ 两位作者均为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

⁴ 波将金等编，史源等译：《外交史》第 1 卷（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第 341 页。

⁵ Auguste Longnon, *De la formation de l'unité française. Leçons professées au Collège France en 1889-1890*, A. Picard, 1922, p 325.

⁶ 肖忠纯：《论近代法国对外政策的扩张性》，《世纪桥》2007 年第 4 期。

对外政策仍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致力于为本国获取自然疆界而非沉溺于奄有诸国的辽阔梦想”，到了其后继者——法国枢机主教、首相黎塞留执政时，法国对自然疆界的要求才“有了大致的界线，而且自然疆界的概念日趋明晰”¹。

黎塞留（de Richelieu, 1585-1642），生于巴黎，曾任法国宰相，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的政治家。其在《政治遗书》中留下了有名的政治遗言：“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为高卢人找回高卢人国王，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地方建立新的高卢。”² 此处的高卢系古罗马人对阿尔卑斯山以西之地的称呼，大致相当于今天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德国一部分。该地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为凯尔特（高卢）人占据，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被古罗马人征服。

虽则如此，但张世明仍认为真正地“更明白地诉诸自然疆界论”者，当属步黎塞留后尘的另一位枢机主教马扎然（Jules Mazarin, 1602-1661）。

马扎然系意大利人，出生于西西里岛。他在出任教廷驻巴黎使节时，得到了黎塞留的赏识，后来封其为枢机主教，并在临终前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举荐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在路易十四执政时期作为外卿入阁成为首相（1643-1661）。马扎然掌权时曾主导了1648-1659年的法西战争，并于战后与西班牙签署了《比利牛斯和约》。根据该和约，西班牙将鲁西荣（Roussillon）、阿图瓦（Artois）、格拉弗林（Gravelines）、蒂永维尔（Thionville）割让给法国，并放弃对阿尔萨斯（Alsace）的主权要求。³ 使得法国追求已久的“自然疆界”终于有机会从空间想象渐次蜕变为现实领土。

迨至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然疆界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经常打着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旗号而登场。

1791年3月，德拉纳维尔（Banchedelà Neuville）致信外交事务大臣，建议按照“造物主所原始形成的地球自然划分”确定法国边界。⁴ 只因当时的国民大会正致力于推翻波旁王朝及抵抗国外干涉势力的围攻，无暇顾及此议。嗣后，伴随着大革命凯歌连连高奏，格雷古瓦（Baptiste Grgoire）教士于1792年伺机提出了“绵延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将萨瓦推入法兰西的疆域，如果它们的政府不是同一个，那将违背于自然的秩序”；“法兰西是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既然自然界到处给它设置的障碍使它不必进行扩张，我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原则恰相吻合”⁵的主张。布里索（Brislot）则明确地抛出了“法兰西共和国必须以莱茵河为边界”的口号。并进而阐释道：“如果把我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如果比利牛斯山隔开的只是自由的各民族，我们的自由就万无一失了。”⁶ 根据这些理论，法国分别于1792年11月、1793年1月通过了兼并萨瓦与尼斯的决议。趁此时机，法国大革命领袖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于1793年1月底提出了兼并比利时的要求，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然疆界”的政策。他煽动道：“担心共和国过分扩张疆界是杞人忧天。共和国的疆界是自然确定好了的，我们将在地平线的各个角落——莱茵河畔、大洋之滨、阿尔卑斯山麓达到这些边界。这些应该是我们共和国的最后疆界。”⁷

伴随着丹东的充满鼓动性的演说词，后来又搭乘着拿破仑大军横扫一切的气势，“自然疆界论”成为法国攻城略地、拓展疆土的利器。

然而，20多年以后，随着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维也纳体系”于1815年确立，法国又回到1790年的疆界，其在大革命时期的一切所获，顿时冰消瓦解。

¹ 张世明、龚胜泉：《自然疆界论的话语建构与时空延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² 波将金等编，史源等译：《外交史》第1卷（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45页。

³ 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8页。

⁴ 张世明、龚胜泉：《自然疆界论的话语建构与时空延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⁵ 张世明、龚胜泉：《自然疆界论的话语建构与时空延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⁶ 阿尔贝·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19页。

⁷ 阿尔贝·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

从1815年到1870年，随着法国工业革命的完成，文化的快速发展，法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回升。尤其是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法国因联合英国战胜了强大的俄国，从而使得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领导者，也使得在农民的帮助下登上了总统宝座、继而成为皇帝的路易·拿破仑成了伟人。

拿破仑三世即位后，立即继承了以阻止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与意大利统一为己任的法国政治传统，重新祭起了“自然疆界论”大旗，以期继续分化、分割这两个国家。同时，伴随着该理论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展开、普及性历史读物的推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播。

实际上，拿破仑三世不但一直以“自然疆界论”为内外政策底色，辅之以“民族原则”之旗号，以期复兴因滑铁卢之败而消沉的法兰西民族事业，而且对当时欧洲一些分裂国家中出现的建立民族联邦的趋向也很感兴趣。相对于咄咄逼人的德国人而言，法国人似乎更同情意大利人，而拿破仑家族也与意大利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在此诸因素主导下，拿破仑三世认为应在意大利半岛上建立一个由皮埃蒙特（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主导的意大利联邦。1860年，作为拿破仑三世帮助皮埃蒙特王国驱逐奥地利占领者、初步统一意大利的酬报，法国获得了北意大利的萨瓦与尼斯。而法国吞并此领土的根据，就是其所声称的应该拥有沿着其“自然疆界”阿尔卑斯山获得军事保障、领土安全的权利。

与此同时，德国（普鲁士、奥地利）、沙俄等国也祭起了“自然疆界”话语，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此时也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各国各色执政人物纵横捭阖，力争使本阶级或本国利益最大化之际。凡此种种，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关注欧洲局势。那么，马恩是如何看待、评价与剖析这个在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的“自然疆界论”的呢？以下，我们以马恩论著文本为中心，辅之以相关资料，予以分析。

二、“中欧大国论”语境下的德意志式“自然疆界论”

1858年7月，拿破仑三世与皮埃蒙特王国首相加富尔签署了一份将奥地利从意大利领土上驱逐出去、帮助意大利统一的秘密协议。作为出兵的条件，法国将因此获得皮埃蒙特西北部的萨瓦与西南部的尼斯。嗣后，法、皮两国随即以各种方式向外界暗示这一协议。意大利随之风声鹤唳，皮奥两国冲突一触即发。

在此背景下，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在此时此刻明确昭告其对意大利及其德国统一问题所应采取的立场，并揭穿欧洲各国统治集团用来为其侵略和掠夺政策辩护的“自然疆界论”等沙文主义理论，“并证明这些理论从战略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¹。1859年2月，恩格斯着手准备素材；3月9日撰就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波河与莱茵河》。那么，在这篇受到过马克思高度评价的力作中，恩格斯是如何展开其思想、剖白“自然疆界论”之荒谬的呢？

文章首先以“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一当时德国大部分报刊的口号为切入点，开始层层剖析德国要到遥远的异国——意大利的波河去保卫本国的莱茵河的内在机理：“在所有这些场合所提出的主要论据全都是政治性的，说什么意大利根本不能独立；意大利不是应当由德国统治，就是应当由法国统治；如果今天奥地利人被赶出意大利，明天在艾契河流域，在的里雅斯特的大门口，就会出现法国人，”接着德国整个南部边境就会暴露于“宿敌”之前。因此，“奥地利是代表整个德国而且是为了整个德国的利益而控制伦巴第的”。²

¹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49页。

²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50页。

而德国上述的荒诞口号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来源于当时德国流行的所谓“中欧大国论”。该论的核心内涵是宣称奥地利、普鲁士及德国其他各邦应当在奥地利的霸权下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该联邦“对于匈牙利和沿多瑙河的斯拉夫-罗马尼亚各国应当用殖民、办学校和怀柔的方法使它们德意志化；从而使这个国家集合体的重心逐渐转向东南方，转向维也纳；此外，还应当重新夺取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个“中欧大国”应当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复活，并且还要兼并原奥属尼德兰及荷兰作为藩属。“这样一来，德意志祖国也许几乎要比现在操德语的范围扩大一倍；如果所有这一切真正实现了，德国就要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和主宰。命运已经在设法使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¹

那么，德国为了本身的防御到底需不需要永远统治意大利，特别是需不需要在军事上完全占领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呢？恩格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像剥笋一样层层剖开了事实真相。

首先，恩格斯并不否认在数个世纪之中，北意大利较之比利时在更大程度上是法国人和德国人逐鹿的场所。接着，他依据历史事实，向读者展示了其发现的战略要地攻守转换的节点：自1525年法兰西国王弗朗斯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在帕维亚被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击败以降，发生在波河流域的战争，已演变成间接地决定着法国和德国命运、直接地决定着意大利命运的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之前，军队作战的区域还仅限于一个省份，军队的运动在整整几个月里都围绕着个别的要塞、阵地或个别的作战基地进行，而到了18世纪末期以后，由于近代式大规模的常备军的出现，只有很大的要塞群、很长的河流或高而险峻的山脉才具有战略意义。从这个视角来看，像波河流域的明乔河和艾契河这样的一些河流线的战略价值才凸现了出来，其战略意义就要比以前大得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固然不否认“放弃明乔河和艾契河德国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阵地”。但“认为这个阵地对南德边境的安全必不可少，那我们是坚决地反对的”。²

接下来，恩格斯提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你有权要求的，别人当然也有权要求。如果我们与其说是为了抵御意大利人不如说是为了抵御法国人而要求取得波河和明乔河，那末，如果法国人为了抵御我们同样也要求取得一些河流的话，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了。”³

基于地理态势与历史遗产的原因，法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重心处于该国北部，比如塞纳河、巴黎等地。反拿破仑同盟的军队分别于1814年3月、1815年7月占领巴黎便使整个法国投降的事实表明，“只要巴黎一陷落，整个法国也就要陷落了”。换言之，“法国疆界形势的军事意义首先在于这些疆界所起的防护巴黎的屏障作用”⁴。对此，恩格斯有过精确的计算：“由巴黎到里昂、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洛特布尔的直线距离几乎相等，大约都是55德里。”但“自洛特布尔起，法国疆界即离开莱茵河，与它成直角转向西北；自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法国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线”。因此，“我们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经过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洛特布尔划出的圆弧，到洛特布尔即中断；法国北部疆界简直成了这一圆弧的弦，弦那边的弓形地区不属于法国。由巴黎到北部疆界最短的交通线，即巴黎-蒙斯线，只有巴黎-里昂或巴黎-斯特拉斯堡半径的一半”。所以，“很难想象有比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疆界更为薄弱的国境了”⁵。

¹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51页。

²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77页。

³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2页。

⁴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2页。

⁵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2-283页。

法国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等国接壤之处，没有任何天然屏障，首都巴黎就位于这一马平川之地。法国人坐拥这四战之地，可谓尝尽苦头。且不说古代（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人轻松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高卢，对其实施了长达500多年的统治；最令法国人难堪的是近代，德国人在130多年时间里竟6次从北面突破法国人防线，其中4次让巴黎人亲眼看到了德国军人的皮靴如何践踏其街道。对此，法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勒贝尔·德芒戎不无自我揶揄地说：“法国肯定是欧洲各国中最少与世隔绝、最不‘闭塞’的国家之一”¹。法国原总统查里斯·戴高乐在二战前曾撰写过《建立职业军》的著作，他认为英国孤悬海中，是天然的堡垒；德国的政治中心和工业中心分散多处，难以一举全毁；西班牙与意大利分别有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唯有法国，不但四周边境缺乏天然屏障，而且首都巴黎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于一体，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敞开着大门。²更不幸的是，法国周边自中世纪以降便有强敌环伺。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法国的这个天然的缺陷屡屡被外敌利用，这个强敌便是哈布斯堡王朝。³

为了弥补这个天然的地理缺陷，早在1678年，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沃邦（1633-1707年）被国王路易十四任命为“筑城总监”，设计并改建了几百座防御性要塞，部署在法国西部、北部及东部边境线上，为法兰西王国装备上了一道缓冲带——“铁腰带”，即所谓的“沃邦防御工事”。但“1814年和1815年攻入法国的敌军几乎毫不介意地通过了三层要塞带。谁都知道，1815年在受到仅仅一个普鲁士军的攻击并经过空前的短期围攻和炮击之后，要塞便一个接着一个投降了”⁴。

面对这种独特且难以改变或弥补的地理条件缺陷所造成的千年历史灾难，除了在技术层面予以修补以外，法国历代的统治者更是在战略层面寻求改弦更张之策。从加佩王朝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开始，法国便形成了危如累卵的生存危机感及思维定式，尤其是查理五世称霸欧洲时期（1519-1565年），更是如此。嗣后，将维护法国本土安全的前线向外伸展，直至遇到天然屏障为止的意识，渐次渗入历代法国最高统治者的脑际，并进而成为衍生“自然疆界论”的温床。

在此，恩格斯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向德国统治者发出了诘问：正如“中欧大国”（德国）的理论家在意大利寻找河流一样，“法国人也正在他们北部疆界的那一边寻找一条河流充当良好的防御阵地。那末这能是哪一条河流呢？”⁵。恩格斯以幽默的口吻表述道，“现在我们把圆规的一脚放在巴黎，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由巴塞尔到北海划一弧线。这时我们会发现，莱茵河由巴塞尔非常准确地沿着这一圆弧流到它的河口。莱茵河上的各要点与巴黎的距离都相等，相差仅数德里。这也就是法国企图获得莱茵河疆界的真正的现实的理由”⁶。

因为，“如果莱茵河属于法国，那末在同德国作战时，巴黎就真正成为国家的中心了”。而且“如果法国人占有了莱茵河疆界，法国的防御体系，就自然的条件而论，就将属于按维利森将军称为‘理想的’、再好不过的那一类疆界了”⁷。但“以莱茵河作为疆界河流仅有一点不足之处。只要莱茵河的一岸完全属于德国而另一岸完全属于法国，那末两国人民谁也不能控制这一河流。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阻止较强的军队（无论它属于哪一个国家）渡过莱茵河；这种事情我

¹ 菲利普·潘什梅尔著，叶闻法译：《法国》（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9页。

² Charles de Gaulle, *Vers l'armée de métier*, Beyrouth,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971, p. 14.

³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⁴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3页。

⁵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5页。

⁶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6页。

⁷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6页。

们已见过几百次，而且战略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¹。所以，“法国人只有当我们不仅把莱茵河而且把莱茵河右岸的桥头堡都让给他们时，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正如在拉多维茨、维利森和海尔布隆纳尔看来，我们德国人要保住艾契河和明乔河以及这两条河上的桥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才算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那时我们就会使得德国对法国完全无能为力，就像目前意大利对德国一样”。但那时，俄国就会像在1813年那样，成为德国的当然“解放者”（正如目前法国，或者更正确地说，法国政府成为意大利的“解放者”一样），而且为了补偿它的大公无私的行为，它一定会只要求一些“小块”领土——如加里西亚和普鲁士——以便使波兰的版图完整，“因为经过这些省份不是也可以‘迂回’波兰吗？”²

恩格斯接着又连续提出几个反诘：“自然疆界”论使德国有权要求波河，“同样也使俄国有权要求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并且在波罗的海方面整化领土，至少把普鲁士的维斯拉河右岸地区全部囊括进去。再过几年，俄国又可以同样有权利提出要求说：俄属波兰的自然疆界是奥得河”；同时，“自然疆界论”如用于葡萄牙，“这个国家也可以要求把领土扩大到比利牛斯山并把整个西班牙划入葡萄牙”；而且，“如果考虑到永恒正义的法则，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的自然疆界至少应当扩展到德意志联邦的疆界或者甚至更远些——到波河，也可能到维斯拉河”³。

实际情况亦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都追求“自然疆界”，都追求绝对的安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追求是以其他国家的不安全为前提的。譬如法国，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时，已然实现了法国数百年来追求的“自然疆界”之梦，当时的欧洲，甚至包括英国都默许了这个既成事实，但这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和平。因为既有的“自然疆界”实现了，新的“自然疆界”又会隐现，如此循环往复，永远不会停歇。对于这样一种进与退的悖论，勒费弗尔的评说可谓一语中的：“只要法国超越它的自然疆界，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如果法国不超越的话，大陆列强是否会因此让它保有自然疆界呢？”⁴。对此，法国人多弩曾表述过大致同样的意见，他在《哲学旬刊》上撰文说，共和国宪法固定的疆界等于宣告了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全体法国人同归于尽。⁵

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后果，是因为“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境内不包括有一部分其他民族。法国有佛来米族的、德意志族的、意大利族的地区。英国是唯一真正具有自然疆界的国家，可是它走出这个疆界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各国进行征服”；“德国有半斯拉夫族的地区，有居住着斯拉夫族、马扎尔族、瓦拉几亚族和意大利族的附属地。而彼得堡皇帝又统治着多少种操其他语言的民族啊！”所以，“谁都不能肯定说，欧洲的地图已最后确定。但是一切改变，如果希望能长期保持，就应当从下列原则出发，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而“军事观点在这里只能具有次要的意义”。⁶

实际上，类似的观点，恩格斯在此前也说过：“奥地利人借口明乔河线是德国南方的自然疆界，企图以此证明他们侵占意大利是有理由的，而德国南方疆界这样的间接防御正好驳斥了这种

¹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7页。

²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88页。

³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93-294页。

⁴ 乔治·勒费弗尔著，河北师范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拿破仑时代》（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5页。

⁵ 乔治·勒费弗尔著，河北师范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拿破仑时代》（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4页。

⁶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98页。

论调。如果情况真如这种论调所说的那样，那末莱茵河就应当是法国的自然疆界。在一种场合有效的一切论据，在另一场合也可能完全适用。但是，幸而法国既不需要莱茵河，德国也不需要波河或者明乔河。谁要从翼侧迂回别人，他也会被别人迂回。”实际上，“从军事观点看来，德国的阿尔卑斯山疆界控制着威尼斯省，这对于德国说来，应当是足够了”¹。

恩格斯所得的最后结论是，“我们德国人如果以波河、明乔河、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废物换得德国的统一，那就是作了一桩漂亮的生意，因为统一会使我们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复辙，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一旦我们取得了这个统一，我们就可以不再防御了。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什么明乔河了”²。

三、“民族原则”背景下的法兰西式“自然疆界论”

前面所述的法国和皮埃蒙特联合发动的对奥地利的战争始于1859年4月29日，到了6月24日，奥军失败，退到明乔河。随后，拿破仑三世因害怕战争的节节胜利促使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故在没有知会皮埃蒙特王国的情况下，与奥皇签订了初步和约。根据这一和约，威尼斯仍然归奥地利统治，伦巴第转到了法国手里。

1860年3月，法国与皮埃蒙特王国在都灵签订条约，法国将伦巴第转交给皮埃蒙特，作为交换，皮埃蒙特王国决定把萨瓦和尼斯交给法国。至此，法国终于如愿以偿。之所以说“如愿以偿”，是因为在此之前的1792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军队曾攻占过萨瓦、尼斯以及莱茵河左岸的部分地区。当时的法国政治家、著名将领卡诺（Carnot）就曾声称：“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是法国古老的自然边界，从这天然范围中离弃的各部分，仅仅是非法篡夺的结果”³。1797年，法国与奥地利签订的《坎波-佛米奥和约》规定，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比利时、莱茵河西岸的占领以及在北意大利建立的山内共和国。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法国占有其几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以莱茵河、比利牛斯山以及阿尔卑斯山为界的“自然疆界”。拿破仑曾不无得意地宣称，法国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伟大的国家，它的领土疆界就是自然向它提供的疆界本身。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拿破仑帝国的瓦解，法国的领土范围又被迫回复到1792年以前的疆界。

拿破仑三世通过与皮埃蒙特王国的联合对奥作战，获得了萨瓦和尼斯两块疆土，在某种程度上往自己的“自然疆界”梦想靠近了一步，但就总体而言，这场战争获得的结果与其设想的目标并不一致，反而有弄巧成拙之虞：最初，拿破仑三世发起这场战争的口号即是为了“解放”意大利而战，他怎么好意思考虑莱茵疆界呢！最终法国不得不将割让给它的伦巴第又慷慨地“赠给”了皮埃蒙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高举拿破仑三世所拥护的“民族原则”，趁机将中意大利暂时并入皮埃蒙特，皮埃蒙特王国立即成为当时颇为可观的力量；拿破仑三世要求奥地利放弃威尼西亚，遭到拒绝；英国认为法国并吞萨瓦及尼斯，是又一个拿破仑征服时代的开始；德国人趁机推动其国家统一大业。所有这些，显然不是波拿巴政府所乐见的。

为此，拿破仑三世大声疾呼：法国人现在不能容许，并且将来也不会容许意大利统一。在此过程中，法国人一边高举独立和自由的“民族原则”，一边试图将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扭曲为以法国霸权代替奥地利霸权。所谓的“民族原则”，是拿破仑三世统治法国30多年时间里一直高举的旗帜。他曾依靠这个口号，一边致力于法兰西民族的复兴事业，一边调解欧洲的民族纠纷，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欧洲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该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在有争议的由多民族聚居的混合边界区域，应以“语言”划分。有如法王亨利四世所宣称的“让说西班牙语的地

¹ 恩格斯：《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9-220页。

²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98-299页。

³ 张世明、龚胜泉：《自然疆界论的话语建构与时空延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¹。当“语言”无法解决问题时，则诉诸民族“感情”，即依照民族愿望，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让混合边界内的居民决定他们的归属，也曾有过成功案例。²但在实践过程中，“民族原则”曾经常被以“民族的保卫者”自居的拿破仑三世滥用，他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从而使得该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之间产生了乖离，乃至于毫无共通之处，成为其挑拨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弱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霸权政策的工具。³

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法国再次获得萨瓦、尼斯这个问题呢？对此，恩格斯于1860年2月撰写了《萨瓦、尼斯与莱茵》一文，以期揭露拿破仑三世要求占有萨瓦和尼斯的实质。该文系恩格斯另一著作《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恩格斯利用他在军事科学、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渊博知识，揭穿了波拿巴对萨瓦、尼斯以及莱茵河左岸地区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另一个目的是根据对奥意法战争的经过和结果的分析，证明马克思和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坚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的正确性。⁴

恩格斯在文章的起首，提出了“问题将起于提契诺河，但最后将在莱茵河结束。一切波拿巴战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夺回法国的‘自然疆界’——莱茵河疆界”的议题。事实上，拿破仑三世上述那种前后矛盾、口是心非的政策，伴随着皮埃蒙特王国渐次统一北意大利以后，亦随之明显，同时，法国进行这次战争所追求的“观念”亦暴露无遗：原来，法国之初意，即是要把萨瓦和尼斯并入其疆域。正如恩格斯所说，“尼斯和萨瓦是路易·拿破仑同意威尼斯和伦巴第归并于皮埃蒙特而要求的代价，他所以要求以这个为代价而同意中意大利并入皮埃蒙特，是因为目前不能取得威尼斯。而法国之所以要合并尼斯和萨瓦，是因为阿尔卑斯山是法国的自然疆界，法国有权占有这些山脉”⁵。

所谓的“自然疆界”有其存在的道理吗？恩格斯认为，从军事方面来看，法国即使获得了萨瓦，其北部疆界仍然是完全暴露的。事实上，在巴塞尔和勃朗峰之间的那段疆界，没有一处是用自然界线划分的；确切地说，这里的“自然疆界”是沿着到埃克雷斯堡垒的汝拉山脉这一条线走的，并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凹形的圆弧。也就是说，按照法国人主观观望与自我利益来界定的“自然疆界”，这条天然的直线不能完成它的任务，这个真正的“自然疆界”也就不再是法式“自然疆界”了。于是，恩格斯幽默地顺着法国人的逻辑问道：“既然如此不自然地使我们的疆界向里弯进去的这个凹曲的弓形地带的居民在‘语言、风俗和文化’方面说来又是法国人，那难道就不应当改正自然界所造成的错误，实际上恢复理论所要求的外凸形状或者至少使它成为一条直线吗？难道住在自然疆界那一边的法国人就应当作为自然界恶作剧的牺牲品吗？”⁶。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自然疆界”是强者肆意兼并他人领土而不问所有者，特别是当地居民是否同意的强权者的霸权话语。

实际上，即使是“最完善的疆界也有可以修正和改善的缺陷；如果不是需要客气一下的话，这种兼并可以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至少从上述论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民族成分方面或者从法国的军事利益方面来说，为吞并萨瓦而制造的一切说法，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瑞士法语区”

¹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6页。

² 1860年4月15日和22日，尼斯和萨瓦两地的居民经过公民投票，赞成并入法国。1860年5月，原被撒丁兼并的芒托纳和罗卡布津纳的人民经过公民投票，绝大部分赞成和法国的结合。同时，占领摩纳哥的撒丁驻军也被迫撤离，摩纳哥也得以永久地保存下来。

³ 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剖析，参见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26-527页；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0-183页。

⁴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5页。

⁵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7页。

⁶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1页。

¹。因为“所谓自然疆界和民族疆界恰恰相合而且同时又非常明显的国家并不很多”²。显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³。

彼时，法国人为了获得萨瓦和尼斯，还提出了语言问题。萨瓦位于阿尔卑斯山北侧，据当时的法国报纸说，萨瓦在语言上和风俗上和法国接近。但据恩格斯观察，“虽然如此，在战前并没有听到过任何同情并入法国的说法”。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792年到1812年期间曾合并到法国的那些地区中，没有一个有丝毫想要回到法国鹰的卵翼之下的愿望。虽然它们已尝到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果实，但是它们从心底里厌恶严格的集权统治、地方长官的管辖以及巴黎派来的文明传教师永无过错的说教”⁴。这是因为，法国对萨瓦等地区的进口贸易大都采取了中国式的闭关自守政策，“除了罗马恺撒时代的专制统治，除了把商业和工业关闭在它那关税壁垒的大牢狱之内，第二帝国没有给它们带来任何东西，最多不过是发给它们一个远走他乡的通行证”，即流放到法属海外殖民地圭亚那。所以，“尽管语言上有共同性、种族上血统亲近，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萨瓦居民似乎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⁵。

另外，在萨瓦人的脑际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意识：“不是意大利征服了萨瓦，而是萨瓦征服了皮埃蒙特”。想当年，该地“强悍的山民以面积不大的下萨瓦为中心，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家，后来又下山进入意大利平原，采用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依次兼并了皮埃蒙特、蒙费拉、尼斯、洛梅利纳、撒丁和热那亚。这个王朝建都于都灵，成为意大利王朝，但是萨瓦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发源地，并且萨瓦的十字徽号到现在还是由尼斯到里米尼、由松德里奥到锡耶纳的北意大利的国徽”⁶。历史上，法国曾于1792年征服了萨瓦，并且将这种统治一直延续至1815年3-6月拿破仑“百日”帝制时期。嗣后，法国将其归还给皮埃蒙特。恩格斯分析，就当前的情况而言，“不存在想要使萨瓦与皮埃蒙特分离的要求”⁷。

事实上，法国人执意要并吞萨瓦，乃是因为“占有萨瓦，首先就会使法国获得一个进攻意大利时必不可少的地区，不然，它就得预先夺取它”⁸。对此问题，恩格斯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萨瓦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是由于它那些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如作为法国的一个省，能够使法军甚至在数量优势不大的情况下占领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境内的山坡，并向谷地出击，因而会发挥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作用；不仅如此，小圣伯纳德山口还会迫使意军向很远的地方派出掩护部队，那时法军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个山口进行决定性的攻击。⁹基于此，恩格斯断言道：“萨瓦在法国手中，与在意大利手中相反，只能成为进攻的武器。”¹⁰。如此一来，从

¹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1-452页。

²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78页。

³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5页。

⁴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8页。

⁵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9页。

⁶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49-450页。

⁷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

⁸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2页。

⁹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6-457页。

¹⁰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8页。

瑞士的利益来看，北萨瓦对瑞士来说等于丹瑙人的礼物。¹ 不仅如此，“这种礼物还包藏着一种威胁。在这种场合下，法国将在军事上控制整个瑞士法语区，使它无法进行任何哪怕是半真半假的防御。法国兼并南萨瓦以后，就会立刻提出并吞瑞士法语区的要求”²。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尼斯的情况。尼斯则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意大利一侧，其西部操普罗凡斯方言，东部则操意大利方言，城里则法语和意大利语不相上下。故其居民在种族、语言、习惯上更接近于意大利人。所以，法国想在尼斯博得同情，似乎比在萨瓦还要难些。至于在皮埃蒙特防务上的价值，尼斯比萨瓦具有更巨大的意义，“把尼斯让给法国，在军事上就等于把意大利军队的集结地点向后移到亚历山德里亚，并放弃皮埃蒙特本土的防御，因为整个说来，只有在萨瓦和尼斯才能够防守皮埃蒙特”³。

实际上，法国在尼斯这段边界上拥有很好的屏障，握有这样一些防御手段来对付最软弱的意大利，实际上是无需乎扩充领土了。但“如果波拿巴主义正好看中了这一点，才借口法国没有自然疆界便无法进行防御而提出所谓自然疆界的要求，那它为占有莱茵河的要求找根据就不知要容易多少倍”⁴。

基于上述分析，恩格斯提出，在围绕尼斯和萨瓦问题进行的这场交易中，亟应关注法国公开宣扬的“自然疆界论”。恩格斯对此问题作了深入阐述，他指出，“由于对这两个省份的领土要求，恰恰使自然疆界论的观点被重新抬了出来，并使法国人重忆起这种观点，而欧洲人不得不再习惯于听这个口号，就好像习惯于听10年来不同时期所宣布而后又被抛弃的其他波拿巴的口号一样——这些就特别同我们德国人有关了。在《国民报》的共和主义者们十分卖力地继续使用的第一帝国的语言中，所谓法国自然疆界主要是指莱茵河。就是今天，一谈到自然疆界，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想到尼斯或者萨瓦，而只会想到莱茵河。哪一个依仗自己国家的侵略野心和侵略传统的政府，敢于重新鼓吹自然疆界论，却让法国满足于尼斯和萨瓦呢？”⁵ 显然，在恩格斯的理解，法国重提“自然疆界论”，是对德国的一个直接威胁，其远景目标是为了恢复所谓莱茵河“自然疆界。”

恩格斯还认为，路易·拿破仑在意大利独立问题上布局亦有其深远意义，它服务于法国所追求的“自然疆界论”，即“意大利至少被分裂为3个或者甚至4个国家；威尼斯属于奥地利；法国由于占领萨瓦和尼斯而控制着皮埃蒙特。教皇国在罗马分出去以后将把那不勒斯同北意大利王国完全分割开来，从而使北意大利王国无法向南方作任何扩张”。“同时，对北意大利王国来说，威尼斯仍然是一块摆在嘴边的诱饵，意大利的民族运动也就会以奥地利为直接的和主要的敌人”。“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在意大利布下的阵势，一旦发生争夺莱茵河疆界的战争，这种阵势可以代替它整整一个军团”⁶。

¹ 丹瑙人的礼物是指谁得到谁就可能死亡的礼物。此典来源于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我害怕丹瑙人，甚至害怕送礼的丹瑙人”。系指特洛伊城战争期间，当时，丹瑙人（希腊部族之一）送给特洛伊人一匹木马表示和解，但其中藏有武装的军士，后来这些军士与城外军队里应外合攻占了特洛伊城。参见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3页。

²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63页。

³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68页。

⁴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72页。

⁵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75页。

⁶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74页。

四、结语

历史上，由于边界的开放性，法国的安全环境和生存状况一直饱受困扰。为了寻求绝对的安全，自法王亨利四世以降，迄至拿破仑三世时代，历代法国统治者多以追求“自然疆界”为己任，即不断以征服者或霸主的身份来获得最大的安全。

早在黎塞留主政时代，他就力主内外兼修。他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为此作为一段注脚：“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¹ 法国的国内政策是维护社会安定，政治团结，没有独立于国土的权威；对外政策则是促使国家强大，没有威胁法国安全的敌人。² 拿破仑更是如此，他认为法国“由于其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地，以及居民的能力和智慧，是欧洲国家的仲裁者”，故而“有雄心要做到把欧洲所有的巨大利益融合在一起，如同对法国各派所已经做到的那样——成为各族人民及其君主之间的仲裁者”³。法国在二战中曾不堪一击，在德国面前，甚至连波兰那样的弱国都不如。即便如此，在二战后的戴高乐时期，这种争霸欧洲、自以为大国的意识都没有泯灭。被称为“戴高乐主义”的内政外交就是对外塑造大国形象，对内强调法国的“伟大”和“历史使命”⁴。

可见，法国人自己认为，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对“自然疆界”的向往无可非议，但现实却是，过于执著的追求“自然疆界”，往往异化为侵略和霸权，以至于在许多欧洲国家看来，“自然疆界原则”已成为法国外交政策的一把标尺。

因此之故，早在 19 世纪初，英国资深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就时常站出来提醒英国人民说：法国的势力已突破它的“自然疆界”——即以居民语言为界限的边界，这说明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维持欧洲“均势”，而是要称霸整个欧洲。⁵ 稍后，在不同时期，这种“自然疆界论”为一些有领土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所接受。德国、俄国等不同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占据过主导地位的野心勃勃的国家，均先后主张各国应该以大山、大河等天然障碍作为它们的分界线，认为没有这种疆界的、但有扩张能力和动力的国家“有权”取得这种疆界。即使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人在谈到中俄《瑷珲条约》时，还竭力强调“阿穆尔河（黑龙江——引者注）是一条无疑义的最好的天然边界”，妄图以此证明沙俄攫取中国黑龙江以北 60 万平方公里中国固有领土的“合理性”。余绳武认为，这正是恩格斯批判过的“自然疆界论”的旧调重弹。⁶

与此同时，法国在追求所谓“自然疆界”的过程中，为了师出有名，经常会以“解放者”的名义在欧洲大陆纵横捭阖，征伐异己。于是，“民族原则”经常会挂在法国统治者的嘴边。本文引言所引亨利四世之名言“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稍作解读的话，亦即强调以语言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和归宿，这是最初“民族原则”使用的一个典范。1792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掌权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先后以“民族原则”作为旗帜，试图将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以对内减轻来自国内反动贵族势力的压力，对外消解其他欧洲国家干涉法国革命的力量。后因滑铁卢之败，法国曾消沉半个世纪，但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在克里木之战中击败了沙皇俄国，标志着法国再次崛起。凭借着这个资本，向来以实现叔父遗愿为己任、相号召的拿破仑三世自然而然地要将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地区的梦想付诸实践，以实现法国沙文主义的传统夙愿。但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不是波拿巴三世力所能及的。况且，法国在这方面的每一次尝试，必然都会招致欧洲一次次结成反法同盟。于是，拿破仑三世便祭起了“民族原则”这面大旗，当然，其中亦夹杂着

¹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第 6 页。

² Henry B.Hill, *The Political Testament of Cardinal Richelieu*,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p.45.

³ 王养冲：《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540 页。

⁴ 王福春等：《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301 页。

⁵ 辛晓谋、宫少鹏：《外交家》，昆明：晨光出版社 1995 年，第 158 页。

⁶ 余绳武：《美化沙俄侵略的强盗理论》，《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1 期。

“自然疆界”的私货。稍后，所谓“民族原则”，更是被俄国人挪用，频繁地应用于对欧洲大陆诸国内政的干涉。

追溯这段历史，彼时有论者指出：“踩着民族原则和自然疆界原则这副高跷，(法国)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阿勒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的话。”¹ 事实的确如此，恰如本文研究所展现的那样，“自然疆界论”与“民族原则”在18世纪以降，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者对于彼时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领土疆域的划分影响至深。如果要对两者的作用与关系做一个比较的话，发端于法国的“自然疆界论”才是影响彼时欧洲政治格局与领土疆域的霸道；而所谓“民族原则”从来都是一个幌子或一种话语，它可以被法国、俄国等欧洲大国用来号召意大利、德意志、巴尔干半岛等诸小国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去，然而，一旦这种运动超越了法、俄等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这些大国一般会从自身的利益考量出发，对所谓的“民族原则”予以淡化，直至渐渐地隐去。对此，恩格斯有过深刻的洞察，他说：“在战争前夜，也和战争中一样，双方通常都力图占领每一个可以威胁敌人和挫伤敌人的有利阵地，而不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² 从这一层面考量，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民族原则”只是一种想象或道德高地，“自然疆界”才是实质或心底渴求。即“民族原则”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要服从于、服务于“自然疆界论”。换言之，如果说，宣扬“自然疆界论”是欧洲大国追求的一种想象的疆域的话，那么，“民族原则”则是其经常用来实现其现实领土要求的一个时常高举的一块遮羞道具。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341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03页。

²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49-250页。